

浙江大学党支部理论学习

参考资料

2021年第7期

党委宣传部编

2021年3月28日

《习近平在浙江》

(专辑四)

目 录

“习总书记做到了‘公生明，严生威’”	
——习近平在浙江(十六).....	1
“习总书记在浙江大力度推进科技强省建设”	
——习近平在浙江(十七).....	11
“习总书记主政那五年是浙江文化建设大步跨越迈入前列的五年”	
——习近平在浙江(十八).....	23
“习总书记把外事工作当作浙江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	
——习近平在浙江(十九).....	48
“习总书记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角色，大刀阔斧地开局”	
——习近平在浙江(二十).....	60

“习总书记做到了‘公生明，严生威’”

——习近平在浙江（十六）

采访对象：傅颂恕，1947年8月生，浙江绍兴人。1993年任浙江省纪委驻卫生厅纪检组长，1997年任省卫生厅副厅长，1999年任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2003年任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2008年任省人大内司委主任委员。2013年6月退休。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7年9月18日

采访地点：杭州市大华饭店

采访组：傅颂恕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您任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任，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对人大工作的重视和指导。

傅颂恕：习总书记对人大工作很重视，他作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履职非常到位。

一般情况下，当时地方上的人大常委会主任都是由书记兼任的，但有的书记不怎么重视人大工作，虽然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但基本不来人大，也很少参加人大的会议，有事情委托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或者办公厅去做。但是，习总书记始终对省人大的工作非常重视，他给我和省委办公厅主任讲：“以后排日程的时候，你们两办尽量协调安排好，凡是人大有会，我都要去参加，时间上尽量不要冲突。”习总书记说到做到，他任省委书记期间，省人大常委会的会，基本都来参加，也都有发言，给我们的工作作了很多具体的指导。

采访组：在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省人大在地方立法和

执法检查方面做了哪些重要工作？

傅颂恕：习总书记始终重视省人大的地方立法立规工作，多次强调要把提高立法质量放在首位。他在浙江工作的5年时间里，省人大开展了多项重大立法工作。其中一项就是2003年6月27日浙江省建设生态省的决定。还有一个就是2006年5月24日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议，其中包含了很多依法治省的具体措施。

我重点讲一讲浙江建设生态省的决定及其落实情况。因为这个决定在浙江省是史无前例的，在各个方面都开了先河，在全国也是非常超前的。为了保护浙江的山山水水和生态环境，省人大常委会每年都对全省各地的环保工作进行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盯住不放，并督促当地政府以法律的硬手段整改、关停、拆除了大量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习总书记非常注重抓落实，他作为省委、省人大的主要领导，始终督促我们各个部门把决定贯彻好。在他的监督下，执法检查连续5年都紧抓不放，过程是硬碰硬的，对那些排污企业产生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对污染企业，我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只要生产过程中有污染环境的情况，严重的一律断水断电，进行调查，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我当时也参加过环境检查工作，记得有一次，钱塘江边的几个化工厂排放污水，影响到钱塘江的水质，我们追究了企业相关领导的责任，还多次检查、督促，直到那几个化工厂都彻底关停。

当然，这个过程也是有反弹的。比如，有的污染严重的企业之所以一直运转，是因为这些企业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有的企业前期已经投入了几千万，引进了很多设备，现在立即关掉，就会带来重大损失。这些问题形成的反弹，如何进行有效的处置？企业转型或关闭以后，职工如何安置？如此等等，都是当时面临的比较复杂的问题，但习总书记的决心很坚定。在他的亲自协调下，有些企业的搬迁改造、环保技术的应用、职工的安置与再就业等等，都得到了妥善解决。

现在，浙江的干部群众已经树立了强烈的环保意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也深入人心，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民，人人都会谴责和举报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企业。浙江省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形成一个全民监督、全民建设的良好氛围。这与习总书记主导的生态省建设的决定和有效落实是分不开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始终非常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对机关干部的工作和生活都非常关心。请您讲讲他在浙江工作期间相关的情况。

傅颂恕：习总书记担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机关干部队伍建设也得到了加强。我们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干部的综合素质一直是比较强的，从学历上来讲，法学硕士和博士有 70 多个，有北大的、华东政法的、西南政法的、浙大法律系的。此外，还有其他学校中文、环保等专业的。但在习总书记来浙江工作之前，人大干部的交流始终没有起色。他来之后，听取我们的汇报，主动说：“我现在是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如果你们对干部的交流有需求，就要提出符合条件的具体名单。”我们听了很高兴。

在习总书记这一届省委班子任职期间，省人大机关提拔了 12 个厅级干部，还交流出去 4 个干部。现在省里一些厅、局级的干部，有的就是我们省人大交流出去的。这是很不容易的。习总书记关心、培养、教育机关干部，把他们放到更合适的岗位上，让他们施展才华，发挥更大的作用，对省人大工作的开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习总书记对我们干部的生活也很关心。省人大办公厅一位同志的孩子得了脑瘤动手术，习总书记知道了，非常关心，叮嘱他要多多照顾家里。年关的时候，那位同志的孩子不幸去世了，但他强忍悲痛，还在加班组织会议。我把这个情况向习总书记作了汇报，习总书记马上找到他，和他谈心，安慰他，给他做了很多疏导工作。

采访组：2006 年，您曾随同习近平同志出访美国，请您讲讲具体情况吧。

傅颂恕：2006 年 5 月，经中央批准，以习总书记为团长的浙江省代表团，应

邀对美国、巴哈马、摩洛哥的部分地区和城市进行友好访问，举办“2006 美国·中国浙江周”活动，开展浙江与新泽西州建立友好关系 25 周年庆典活动，拜会政界高层人士，开展在美华人华侨联谊活动，参观考察摩托罗拉等一批大企业大集团，进一步加强经贸、文化、教育、金融、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这次出访以美国为重点，按照当时中央确定的中美关系战略布局的要求，从地方角度积极配合中央的总体外交大局，也是落实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不久前访问美国和摩洛哥等国所确定的各项任务。这次习总书记带队出访，所做的重点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美国纽约市、新泽西州举办“2006 美国·中国浙江周”活动，进一步推进浙江省与美国在经贸、旅游、金融、文化、教育、人才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交流、合作、联谊为主题，广泛开展了经贸洽谈、旅游推介、金融合作、文化展示、人才教育交流等活动。5 月 9 日上午，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举行“2006 美国·中国浙江周”开幕式，习总书记作了题为《共享机遇 共谋发展》的主旨演讲，向美国各界推介浙江。他讲到，浙江具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优势，民营经济占经济总量超过 70%，成为中国大陆民营经济第一大省；浙江具有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所处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门户；浙江具有良好的产业优势，中小企业、专业市场和工商产业紧密结合，互相依托；浙江的环境优势体现在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港口资源得天独厚，风光秀丽，旅游资源丰富；浙江的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在浙江，没有一个人因为贫困而失去上学的机会。他还对美国企业家说：“浙江具有得天独厚的人文优势，以善闯天下著称的浙商遍布世界各地。如果你到浙江投资，你能够找到最不怕吃苦的高素质劳动力，能够找到推销各种产品的现代商人。”习总书记的演讲很真诚，也很感人，吸引了不少美国企业家。就在开幕式上，中方和美方企业签署投资项目 63 个，总金额 24.9 亿美元，协议外资 10.2 亿美元；贸易项目 1

个，出口额 5000 万美元。这 63 个项目中，总投资超过 3000 万美元的有 28 个，项目涉及机械、纺织、医药、化工、电子、房地产、物流等领域。

二是举行浙江省与新泽西州建立友好关系 25 周年庆典活动，进一步发展与该州的友好关系。浙江省与新泽西州自 1981 年建立省州友好关系以来，双方在经贸、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效。浙江省还选调多名年轻干部在肯恩大学深造，温州和肯恩大学合作举办了培训班。温州、绍兴、丽水分别与新泽西州的尤宁郡、萨默塞特郡、罗威市建立了姐妹城关系。总部位于新泽西州的默克医药公司在杭州成立的合资企业——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目前运营状况良好。

5 月 8 日，习总书记在新泽西州首府特伦顿与州长科奇内举行会谈，就进一步加强两省州的合作与交流，布局 and 推动两省州的友好关系达成共识。会后举行签约仪式，习总书记与科奇内共同签署《关于拓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与美利坚合众国新泽西州友好省州关系的协议》，确定了进一步加大力度发展经济合作、鼓励产业创新、扶持文化和教育领域合作与交流的共同目标，明确了两省州进一步开展合作交流的重点领域，强调要在经贸、文化和教育等双方政府和人民共同关注的领域加强相互了解，强化对话机制，并采取互惠互利的行动。

三是利用地方外事资源，积极主动地做美国政界高层人士的工作。在美访问期间，习总书记与美国高层人士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见活动。仅 5 月 10 日至 11 日上午一天半的时间里，习总书记先后专门拜访和会见了当时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前商务部长唐·埃文斯等 63 人。在会见活动中，习总书记紧密结合浙江实际，全面介绍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积极宣传我国坚持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情况。同时，习总书记还从正面阐述和回答了美方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台湾问题等，得到美方高层人士的广泛认同。

习总书记在阐述中美关系时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双方在众多领域和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上拥有重要的共同战略利益，在国际事务中有许多共同语言，有许多共同问题需要共同努力去解决，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对两国人民有利，也对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利。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和平求发展，美国在中国的发展中也得到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是利好，而不是对立性的竞争。

习总书记在阐述中美贸易关系时说，美国是浙江重要的贸易伙伴，2005年浙江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总额达到186.6亿美元，其中进口40亿美元。美国目前在浙江投资的企业有4163家，直接投资额28.1亿美元，有相当部分产品是用来出口的。中美经济互补性很强，合作潜力很大，中美贸易也要体现这种互补性。中美贸易当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通过加强合作、加快发展来解决。

习总书记在阐述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时说，我国已经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进行部署，保护知识产权是自主创新的必然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坚定不移实行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不断健全法律法规，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我们必须用历史 and 发展的眼光看待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希望中美双方就事论事，更加务实，在解决相关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增进了解、加强合作。

习总书记在阐述台湾问题时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绝不能分裂出去，这是中美关系的一条底线。我国政府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同台湾同胞一道，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四是访问和接触了一批美国大企业和财团，寻求经贸合作机会。在美访问期间，习总书记分别与高盛集团、花旗银行、纽约证交所、朗讯公司及贝尔实验室、摩托罗拉公司、联邦快递公司等一批美国大企业和财团高层进行了会谈。习总书记

着重介绍了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情况、今后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条件，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并就他们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通过会谈，这些企业和财团高层进一步增进了对中国和浙江的了解，并对浙江发展表现出浓厚兴趣，表示了明确的合作意向。

五是开展在美华人华侨的联谊活动，切实做好对侨胞的统战工作。在美访问期间，代表团受到在美华人华侨的热烈欢迎。我们抓住时机，开展了一系列拜访、会见、座谈、邀请等联谊活动。5月7日，习总书记等省领导在纽约法拉盛东丽宫大酒楼专门会见了美国东部地区的31个华人华侨社团的200余位侨领。他们当中大多是浙江籍各主要侨团代表，还有不少是上海、江苏、福建籍侨团代表。见面会上，习总书记与侨领们叙乡情、谈合作、谋发展，气氛热烈而友好。在侨界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充分肯定在美华人华侨对祖国统一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并鼓励他们继续发扬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为反“独”促统、推进祖国统一，为促进中美经贸合作交流多作贡献。在美华人华侨对浙江代表团访美和举办浙江周活动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侨领们听了习总书记的讲话后纷纷表示，得知家乡省情、侨情的新发展，对习总书记提出的“浙江发展必将为侨胞带来美好发展前景”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表示愿为促进中美合作交流、为推进家乡的繁荣昌盛作出新的贡献。许多侨领认为，浙江省在纽约这个世界第一大都市搞这样的活动，是经济实力和对外开放的体现，为海外侨胞提供了进一步了解浙江、寻找商机的机会。这个活动搞得很好，海外侨胞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那次出访美国，还顺访了巴哈马和摩洛哥两国，会见了相关政府负责人，拓展经贸合作的渠道。请您讲讲具体情况。

傅颂恕：5月12日至14日，习总书记率代表团访问巴哈马国，重点考察了当地的经济特别是物流、旅游、经贸等情况，进一步加深对该国的了解。巴哈马海洋和旅游资源丰富，是世界主要渔场之一和著名旅游胜地；航空和海运业发

达，拥有自由港，是国际海运中心之一和世界第三大船舶注册国。在访问巴哈马期间，习总书记与巴哈马旅游部长、农业和海洋资源部长、财政国务部长和议员等会谈，就充分利用巴哈马地理区位优势、自由贸易港平台进一步发展同浙江的经贸合作等进行了广泛讨论。

5月16日至20日，习总书记率代表团访问摩洛哥王国。浙江与摩洛哥经济互补性较强，贸易额当时有5亿美元，占中国与摩洛哥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强。摩洛哥在浙江投资企业3家，实际投资262万美元；浙江企业在摩洛哥设立贸易和非贸易机构7个，总投资193万美元。浙江的纺织服装、茶叶等商品深受当地居民喜爱，摩洛哥的消费市场潜力很大，发展同摩洛哥及其周边国家的出口贸易前景广阔。访问期间，代表团受到了摩洛哥首都所在地拉巴特大区政府、议会的高度重视。习总书记与拉巴特大区政府最高行政长官哈桑·阿姆拉尼等举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拉巴特大区政府表示，希望同浙江建立友好省区关系，同浙江发展经贸合作，要求进口汽车、电力等设备，邀请浙江建工企业参与拉巴特新区的桥梁、隧道等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在其开发区共同建设纺织服装、电器等企业。习总书记对拉巴特大区政府和议会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对提出的建议予以积极回应，并邀请拉巴特大区政府和议会领导到浙江访问。双方在深入讨论基础上，就建立友好省区关系、开展经贸合作等达成初步意向。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这次出访效果显著，后续工作落实到位，是一次非常成功和高效的外交活动。请您讲讲当时社会各界的反响，以及这次成功出访带来的启示。

傅颂恕：这次出访是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结束访美后经中央批准的第一个加强与美国交流的地方主要领导带队的团组，而且在美国开展这么大型的经贸活动，浙江还是第一次。习总书记带队顺利完成出访任务，特别是组织好“2006美国·中国浙江周”活动，意义十分重大。

由于习总书记高度重视、准备充分、安排周密、时机恰当，这次活动不仅在经贸、旅游、金融、文化、教育、科技和人才等方面取得实质性成果，巩固和发展了与新泽西州的友好省州关系，而且通过多角度宣传浙江，展示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姿态，表达加强与美国各界合作的愿望，进一步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良好形象，在美国各界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浙江代表团的访问和浙江周的举办，让美国人民不用到中国就可以看到浙江。通过这样直接、正面的宣传交流方式，有助于美国各界更多了解浙江，有助于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对浙江代表团的访问和浙江周活动，美国政界、商界、新闻界和普通民众反响十分热烈，多家媒体广泛关注。美国著名作家库恩博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人民高度欣赏发生在浙江的故事，特别是有关浙江人民的创业精神的故事。浙江在推动中国与美国友好关系方面扮演着一个特殊角色。”讲这次出访的启示，我觉得主要有两点。

一是认真筹备、精心组织，确保出访圆满成功。这次出访，规格高、规模大、内容多、情况复杂。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习总书记明确提出“周密部署，精打细算，力求明显效果，确保活动安全”的要求。省里专门成立筹备工作小组及相关工作班子，早在2005年下半年就着手前期准备工作。根据出访的实际需要，组织了以习总书记为团长的浙江省代表团以及经贸分团、侨务分团、金融分团、人事教育分团、旅游分团、新闻分团和文化分团。在出访前，从方案制定、资料制作、客户邀请、项目落实，到新闻宣传、后勤保障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在出访期间，对整个活动实行统一协调指挥制度，明确代表团和各分团的任务和职责，实行团长责任制，加强重大活动的统一协调和各分团之间的相互配合，重要活动实施前抓好检查和再落实，做到工作到位、万无一失，保证了各项活动有序顺利进行。

二是进一步做好在外华人华侨的工作。海外华人华侨的力量正日益壮大，特

别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他们热爱祖国，关心祖国，愿意也有能力为祖国的事业服务。这是丰富的外交资源，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浙江是中国的主要侨乡之一，目前旅居海外的浙江籍华人华侨、港澳同胞有 140 多万人，分布在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在美国的浙江籍华人华侨有 28 万人。在美访问期间，代表团的各项活动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许多知名在美侨领侨胞直接参加了浙江周的协办工作。代表团同美国政界、企业界高层人士的一系列会见活动，主要是通过原籍浙江的华人华侨安排的。这启示我们外事和侨务部门要认真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做好华人华侨的工作，主动和他们保持联系，了解他们的情况，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更好地为我国外交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采访组：您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将近五年时间。请您谈谈对他的总体印象。

傅颂恕：习总书记离开浙江之前，找我谈话。他问我：“你对我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我说：“不敢说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但我发现您作为领导人，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就是‘公生明，严生威’。‘公生明’，是因为您能公道正派地处理解决好每一个问题，以党和国家的事业为己任，能够做到恪尽职守和大公无私，所以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信任；‘严生威’，是因为您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所以产生了威信，产生了榜样的力量，带动了我们的正风正气。”

其实，我后面说的“严生威”和林则徐讲的“廉生威”的诗句有一点区别，“严生威”比“廉生威”的内涵要更丰富，“廉”只是做官的底线，“严”则是在方方面面对自己严格要求。

总而言之，习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有着卓越战略规划能力、有着雄才大略的领导人。

来源：《学习时报》2021 年 3 月 22 日

“习总书记在浙江大力度推进科技强省建设”

——习近平在浙江（十七）

采访对象：蒋泰维，1955年1月生，浙江杭州人。2003年2月任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厅长、党组书记。2013年3月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2018年5月退休。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7年9月19日

采访地点：杭州市大华饭店

采访组：蒋泰维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您任省科技厅厅长、党组书记。请您讲讲他在浙江期间对推动科技创新所做的工作和他的科技创新思想。

蒋泰维：习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敏锐把握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深入市县、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调查研究，立足浙江实际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科技创新思想，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大力度推进科技强省建设，为浙江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而深远的作用。

我从2003年2月开始担任省科技厅厅长、党组书记，习总书记在浙江期间就科技工作特别是科技创新方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阐发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我是比较清楚的。首先，习总书记是从三个角度深刻认识科技创新的。

第一，习总书记前瞻性地指出人类社会开始走向知识经济时代。2003年4月28日下午，习总书记考察科技工作，他在省科技厅座谈会上阐述了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强调指出：“现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应用领域不断拓宽，

成为当代高技术发展的热点。生命科学及生物技术正在酝酿着重大突破，将引发农牧业和医疗与诊断技术的革命。以纳米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层出不穷，对先进制造业及医药、环保、能源等带来深刻影响。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渗透发展。科学与技术趋向一体化，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速度越来越快。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科技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类社会开始走向知识经济时代。”

第二，习总书记深刻指出科学技术在当今信息时代对生产力发展产生的“幂数效应”。他强调，当代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内在要素，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其他要素，当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当代科学技术决定着生产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在蒸汽机时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的是加数效应；电气化时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产生的是乘数效应；在当今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产生的就是幂数效应。由科学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第三，习总书记精辟地论述了科技创新的极端重要性。2003年3月2日，浙江省在北京举行经济社会发展恳谈会，习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他指出：“当今世界，科技革命方兴未艾，高新技术突飞猛进，创新浪潮如火如荼，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核心，包括文化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谁拥有先进科技，谁就能占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谁在经济活动和物质生产中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谁的竞争力就越强；谁能集聚大批高层次人才，谁就能获得竞争的主动权。”

这三点，集中代表了习总书记当时对于世界科技发展大趋势的认识，对于科技创新重要性的认识，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敏锐、十分超前的。当时，浙江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期，习总书记对科技创新的深刻认识，为之后浙江全面推进自主创新、引进先进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设科技强省等工作提供了重要

指导。

习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在许多会议和不同场合都反复强调浙江经济发展必须要“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凤凰涅槃”主要靠的就是自主创新，其实质就是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2006年3月8日，习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给老师和学生们的演讲中系统阐述了“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思想，他特别强调指出：“‘凤凰涅槃’靠什么？靠自主创新，包括自主技术的创新、自主品牌的创新。‘腾笼换鸟’，一方面要走出去，一方面要引进来。”“引进外资绝不仅仅是资金问题，引进来的是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广阔的国际市场。”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提出“八八战略”，把建设科技强省作为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请您讲讲建设科技强省对“八八战略”的重要意义。

蒋泰维：习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市县、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八八战略”是习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立足全局，着眼长远，提出并实施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总战略。

习总书记在2003年7月10日举行的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系统论述了“八八战略”的主要内容，即“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其中第八个方面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习总书记讲的文化大省包括“四个强省”，即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不仅在第八个方面集中讲科技强省，实际上科技强省思想渗透和反映在“八八战略”的各个方面。比如，在第三个方面，习总书记强调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进“数字浙江”建设，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发展沿海临港重化工业，努力培育发展装备制造业，全面提升浙江产业

发展的层次和水平。

2004年9月28日，习总书记听取杭州市关于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建设和西博会筹备情况汇报之后发表讲话指出：“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杭州的一大特色和明显优势。但从总体上讲，我们的科技综合实力还不是很强，特别是人才高地建设捉襟见肘，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讲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靠什么转变？最终还是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这是规律使然，是必由之路。在这件事上，谁见事早、反应快、力度大，谁就抓先机、上得快、成效好。”“要进一步增强依靠科技加快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和自觉性，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和科技强省强市工作，进一步加强科技规划的制定，加大科技管理的力度，深化科技体制的改革，完善科技创新的政策，推进科技项目的实施，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全面提高我省的科技工作水平。”这个讲话是对全省科技创新工作的全面有力指导。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协调，组织引进清华大学、中科院等大院名校与浙江共建创新载体，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请您讲讲这方面情况。

蒋泰维：由于历史原因，浙江省缺少大院大所大企业和著名大学。为了弥补浙江自主创新能力薄弱这一短板，省科技厅向省委省政府提出“引进大院名校共建创新载体”的建议，得到习总书记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

2003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总书记带领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亲自到清华大学拜访，座谈加强省校合作、共建创新载体事宜。他当时列举了浙江在产业结构、科技创新、区域经济结构、人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希望得到清华在科技知识和人才方面的支持。经过大半年考察洽谈，2003年12月31日，双方在杭州黄龙饭店正式签署省校共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协议。习总书记在签约仪式上发表讲话指出：“引进国内外大院名校联合共建科技创新载体，有利于团队式引进人才，捆绑式开发项目，股份制深化产学研合作，人文型提升城市品位，

高层次改善投资发展环境，有利于增强我省科技创新能力，有利于促进我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推进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共同组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将进一步巩固合作成果，增大合作范围，提升合作层次。对于拓展清华大学的发展空间和增强我省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研究院筹建开始，习总书记多次亲临视察指导。2004年3月23日，习总书记到嘉兴视察研究院筹建工作；2005年4月10日，他为研究院总部大楼奠基揭牌；2008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回浙江视察工作时专门来到研究院，表示当时建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是对的，建在嘉兴也是对的。长三角研究院成立十周年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批示指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十年来的探索实践证明，省校合作是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科技与经济融合的有效模式。希望总结经验，再接再厉，不断巩固省校合作成果，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努力把长三角研究院建设成为具有先进水平的新型创新载体，为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长三角研究院成为省校合作的典范、产学研合作的样板。经过10多年发展，研究院先后组建了生物医药、生态环境、先进制造、信息技术4个研究所和2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在嘉兴、宁波、杭州、台州等地设立多个产学研基地，累计承担各类科技项目519项，获得国家和省市各类科技奖励100多项，转化一大批科技成果，培训学员4万多次，组织“海外清华学子浙江行”，引进200余名海外高层次人才落户浙江，对浙江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还亲自指导、推动建立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蒋泰维：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是习总书记担任福建省省长期间，在福建南平市

首先建立并取得明显成效的，科技部充分肯定这一经验并在全国推广。2003年初，我们会同省农办等部门专程去学习福建南平经验，回来后建议向全省欠发达乡镇派遣科技特派员，得到习总书记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他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导推动建立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

根据习总书记的指示，从2003年开始，省科技厅会同省农办、农业厅从浙江大学、省农科院等涉农高校院所抽调100名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和实践经验的科技人员下派到全省100个欠发达乡镇蹲点工作，为期一年，可以连选连派。省科技厅、财政厅在农业科技推广项目上立项，并对工作经费、生活补助给予配套支持。后来，省级科技特派员增加到200名派驻200个乡镇。全省各市县也响应省里号召，组织相关高校院所为当地乡镇派遣农村科技特派员，总数达到1279人，覆盖全省所有乡镇。农村科技特派员下乡后，手把手帮助农民，传授先进适用农业技术，因地制宜开发各种经济作物，提高种植业、养殖业和农村产品加工水平，对欠发达乡镇农民脱贫致富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农村科技特派员俯下身，躬耕田野，在广大农村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把致富的种子种在了乡野沃土上，更把一颗颗赤诚之心“种”进了农民的心里，被广大农民誉为“财神爷”。与此同时，科技特派员制度还推动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促进了涉农高校院所和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完善了基层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密切了农村党群关系。

2006年9月8日，习总书记在省科技厅报送的关于全国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会议情况汇报上批示：“要认真贯彻全国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好，建立长效机制，加强领导，总结经验，及时完善，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适时可对优秀的科技特派员进行表彰。”根据习总书记的指示，省委省政府每年表彰一批优秀科技特派员和先进工作单位，并在“乡乡都有特派员”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

团队特派员和法人特派员制度。一个县的若干个乡镇科技特派员组成一个团队，发挥团队成员各自的专业特长，取长补短，为更多的乡镇和农民服务。一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相对固定地结对帮扶一个或几个县，开展农业科技帮扶。在习总书记的亲自关心指导下，浙江推行农村科技特派员的工作在全省开花结果，取得显著成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15年来，共派遣个人科技特派员15938人次，法人科技特派员25家，团队科技特派员354个，累计推广新品种新技术14000多项次，开展技术培训12.8万场，培训675万人次，兴办农业科技企业432家，建立利益共同体1623家，创建科技示范基地130多万亩，建立科技示范户34073户。据重点帮扶的26个县统计，2015年低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765元，比2010年增长106.77%，基本消除了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群体。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是如何亲自倡导和大力推动“数字浙江”建设的？

蒋泰维：习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亲自倡导、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软件、通信、互联网等信息产业发展，把打造“数字浙江”作为“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2005年三四月份，习总书记连续考察调研浙江电信、浙江移动、浙大中控等一批软件、通信企业。他在调研座谈时指出：“我们要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科学判断发展阶段变化，进一步增强加快发展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并推进信息化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把建设‘数字浙江’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基础性工作、主导性政策研究好、落实好，把信息产业特别是软件业、通信业作为我省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引导好、发展好。”他还强调：“信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支柱性、战略性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倍增效应，更要牢牢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乘势而上，加快发展。”“加快发展信息产业，是我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改变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2006年3月28日，习总书记亲切接见首届“春回燕归·浙籍IT精英峰会”与会代表并合影留念。习总书记对这场峰会非常重视并大力支持，他在讲话中指出：“今天这个峰会，‘春回燕归’这个名字起得很好。杭州现在是春暖花开、桃红柳绿，燕子回来了，家乡的骄子归来了，来看看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家乡。这也表明，浙江IT业界的春天也来了。……浙江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变化，一条重要经验是重在创造，重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习总书记不仅重视浙籍IT精英的回归和培育，而且重视国内外高科技企业的引进与合作。国际知名企业董事长或CEO来杭，习总书记都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接见会谈。

10多年来，浙江尤其是杭州信息产业迅速发展，数字经济走在全国前列，涌现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高科技企业和上市公司。这完全得益于习总书记当年制定并推动落实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在深入调研基础上，领导制定并落实科技强省建设规划纲要和政策措施，使浙江省的科技创新有了长足的进步。请您具体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

蒋泰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市县、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调研，他带队到北京、上海、江苏等外省市考察交流时，也专门安排考察高科技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

2006年1月9日至10日，习总书记亲自参加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并在小组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回来后，他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全国科技大会精神，亲自主持开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课题调研，由省委政研室牵头，省委办公厅、省科技厅、省发改委等部门参加，先后到杭州、湖州、宁波等地调研。3月20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自主创新大会，习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经过会议讨论并经习总书记亲自修改审定，省委省政府正式印发了《浙江省科技强省建设与“十一五”

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的若干意见》，对建设科技强省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

在习总书记推动下，浙江组织实施了“八大科技创新工程”和 26 个重大科技专项。“八大科技创新工程”即：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工程、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工程、生态省和循环经济科技创新工程、科技兴海创新工程、人口健康与公共安全科技创新工程、服务业科技创新工程、基础研究创新工程、软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这里特别要强调说明的是，习总书记主导推动的“八大科技创新工程”，不仅把重点放在工业、放在先进制造业上，而且统筹兼顾，高度重视，全面部署农业、生态、海洋、健康与安全、服务业科技创新，特别是把基础研究和软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纳入科技创新重大工程，这在一个省的科技发展规划与政策中是非常少见的，可以说极具战略眼光和超前思维。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往往只注重技术创新特别是成果转化，注重科技创新对近期经济发展的作用，而忽视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忽视这方面的投入和布局，认为这主要是国家的任务；至于软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更没有摆到与技术创新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习近平同志科技创新思想和决策部署的指引推动下，浙江省科技创新有了长足进步，2011 年科技综合实力、区域创新能力和企业创新能力分别跃居全国第 6 位、第 5 位和第 2 位，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跃居全国第 2 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2016 年分别达到 40.1%、38.8%和 22.9%。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调整和优化，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经济平稳快速发展。2016 年浙江 GDP 达到 46485 亿元，比上年增长 7.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 GDP 达 12577 美元，接近世界银行分类标准中的高收入经济体水平。

采访组：您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工作 5 年，对他的思想品格和工作作风一定有比较深刻的感受和认识。请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蒋泰维：从2002年到2007年，我有幸在习书记直接领导下工作，他优良的思想品格、工作作风、人格魅力和领导艺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讲四点突出的感受。

一是勤学善思，学以致用。习书记非常注重学习，知识渊博，他在讲话中经常引经据典，不仅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而且善于用古今中外的典故阐述深刻的道理，深入浅出，生动形象。2003年7月，他在县以上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研讨班和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用著名学者王国维论述治学的三种境界来阐述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他说：“我看，领导干部抓理论学习也要有这三种境界：第一，理论学习上要有‘望尽天涯路’那样志存高远的追求，要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冷清和‘独上高楼’的寂寞，静下心来通读苦读；第二，理论学习要勤奋努力，刻苦钻研，舍得付出，百折不挠，下真功夫、苦功夫、细功夫，即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人憔悴’也心甘情愿；第三，理论学习贵在独立思考，学用结合，学有所悟，用有所得，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众里寻他千百度’，最终‘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领悟真谛。”理论学习本来是政治要求，习书记这么一类比，大家就很容易记住了，就能够比较自觉地去不断深化学习。在习书记看来，读书不仅要有明确的目标、有不移的恒心，还要提高读书效率和质量，讲求读书方法和技巧，在爱读书、勤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提高思想水平，解决实际问题，实现自我超越。

习书记不仅这样要求领导干部加强学习，而且以身作则带头学习。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总要抽时间看书学习，利用周末时间请专家讲解。他曾专门请浙江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吴光讲授中国哲学，还请浙江大学的陈村富教授讲授西方哲学。

二是百姓情怀，心系群众。习书记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冷暖安危放在心头，他在浙江大力推行的各项改革与发展举措，都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经

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特别是他大力倡导并推行的“山海协作”、“欠发达地区帮扶工程”、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城乡一体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重大举措，更是为了缩小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促进欠发达地区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习总书记走遍浙江的山山水水，经常下基层、到企业、进山村调查研究，逢年过节，都要亲自慰问部队战士、贫困农户和下岗职工。

习总书记亲自蹲点联系发展相对落后的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曾于2003年4月24日、2005年3月22日、2006年5月25日先后三次到下姜村调研指导，要求省科技厅安排一名科技特派员派驻枫树岭镇开展科技帮扶。按照习总书记的指示，我们很快派出一位科技特派员，在对当地资源特色调研基础上重点发展既是常用药材又是天然黄红色素提取原料的栀子，后来又重点发展杭白菊，中药材产业逐渐成为这个山区乡镇致富的特色产业，农民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习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身体力行，亲自推动建立的领导干部每年下基层接访制度，深得人民群众好评。他工作十分繁重，日理万机，但他总是在百忙中抽时间批阅人民群众来信。

三是严以律己，坚持原则。习总书记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刚到浙江工作不久，就在大会上讲：“我也郑重地向同志们表个态，在党风廉政方面，我一定以身作则，不仅要管好自己，而且要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诚恳地希望大家对我进行监督。今后，无论什么人打着我的旗号办捞取个人好处的事，大家都要坚决抵制，决不能让招摇撞骗、别有用心者得逞图谋。”

习总书记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2004年，省委组织部派我去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一年。走之前，习总书记专门叮嘱我要珍惜机会，好好学习。学习结束后，我问习总书记的秘书，可不可以给习总书记带一点北京特产以表谢意，得到的回复是坚决不行，习总书记不让任何人送任何东西。还有一次，一位高干子弟找到我，希望在浙江找一个地方建一个全新理念的环保型城市建设项目，习总书记得知此事

后，专门跟我说，要把握好原则，按规矩办事。

四是世界眼光，战略思维。习总书记看问题、作决策，具有卓越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总是立足全局、着眼长远，把握重点、统筹兼顾，站在国家、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高度，准确把握世界和我国、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因势利导，深化改革、创新发展，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社会全面进步。

习总书记提出并推行的“融入长三角、接轨大上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山海协作”，建设生态省和文化大省，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和体育强省，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发展海洋经济、循环经济，建设平安浙江、法治浙江等重要思想和战略部署，都是立足全局、着眼长远，对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来源：《学习时报》2021年3月22日

“习总书记主政那五年是浙江文化建设大步跨越迈入前列的五年”

——习近平在浙江（十八）

采访对象：杨建新，1952年5月生，浙江诸暨人。曾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对外宣传办公室（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2003年2月任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2018年5月退休。

采访组：田玉珏 薛伟江 路也

采访日期：2017年9月16日

采访地点：杭州市大华饭店

采访组：杨建新同志，您好！请您先介绍一下您与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杨建新：习总书记刚来浙江工作的时候，我还在省台办当主任，第一次见面他就关心我的工作问题。因为我记得那一次不是正式工作场合，我印象很深，他微笑着，同我聊起了对台工作，我向他简要汇报了浙江对台工作的一些特点，然后他问我，听说你要离开台办到文化厅工作？我说不是我有要求，是我在台办工作时间长了，省委有这个考虑，我说我在台办很安心，而且学到不少东西。您从福建来，我也知道您很重视对台工作。他笑着说：“对台工作是很重要，文化工作也很重要，尤其是浙江，文化底蕴很深厚。如果省委定了，那 goes 去，好好干。”2003年初，我到省文化厅任职，省人大常委会上，还是习总书记给我颁发的任命书。

这以后，我多次在不同场合同习总书记聊到文化工作。大约一年以后，有一次习总书记问我：“到文化厅工作有段时间了，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我

说：“如果有可能，您最好给我两个小时，我仔细梳理一下，让我把关于浙江文化建设的一些感受和想法好好地跟您汇报汇报。”习总书记很爽快地说：“好啊，这个我很感兴趣。”可惜的是，因为他工作实在太忙，这个约定一直未能实现。当时我还向他如实地讲到，在文化厅工作比较顺利，要说困难，就是上访人员太多。他有点吃惊，询问详细情况。我就向他汇报了文化系统摊子大，人员多，政企、政事不分，历史遗留问题不少，导致上访人员较多。习总书记听了以后非常重视，马上表态：真没想到文化系统也有这么多上访人员，我把问题带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习总书记说到做到，在他的重视支持下，省里陆续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文化系统不仅上访问题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更重要的是从发展规划到软硬件条件，全面迎来了文化建设的“春天”。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主政浙江期间作出了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决策，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战略决策的主要情况。

杨建新：习总书记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视，我是感受很深的。他的人文情怀和文化自觉，既是发乎内心的，更是建立在对文化建设重要性的科学认识之上的。在他的治省方略“八八战略”中，其中一大战略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事实上，浙江是在2000年出台《建设文化大省纲要》的。习总书记到浙江任职后，并没有另提口号，也没有另搞规划，而是继续扎实推进浙江文化大省各项建设工作，用实际行动真正做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

与此同时，习总书记在推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过程中，深入系统地进行了多次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浙江省委于2005年7月召开了十一届八次全会，主题就是研究浙江的文化发展问题。全会围绕文化大省建设，全面深刻地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习总书记在这次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系统阐述了什么是文化、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文化建设与增强浙江软实力之间的关系，以及今后浙江

发展过程中为什么要把文化放在重要位置等重大问题。在讲话中，他在肯定浙江文化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同时，提出了“三个不相适应”和“一个不够协调”。

“三个不相适应”是指：浙江的文化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文化建设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文化建设与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不相适应。这就是要求我们“跳出浙江看浙江”，站在全国和全球的背景下来看浙江发展，这也就对我们文化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不够协调”是指，文化建设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够协调。解决这些问题，习总书记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文化事业繁荣，进一步壮大文化产业，进一步加强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社会事业的发展”，同时构建加快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整体框架，可以简称为“3+8+4”。“3”就是着眼于“三个力”，即增强先进文化的凝聚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社会公共服务能力。“8”就是实施文化建设“八大工程”，即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习总书记亲自担任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主任，这项工程的核心任务就是梳理发掘浙江的人文遗产和文化基因，传承浙江优秀传统文化，总结历史经验，凝聚和弘扬浙江精神，以文化的发展引领浙江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实现全面发展。习总书记亲自担任主任，我的理解，是因为这项工程是基础，是源头，把浙江精神梳理好，激发出来，就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带动浙江的整体发展。所以我认为习总书记是抓住了文化建设的“牛鼻子”。“4”就是实现“四个强省”的目标，即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

省委这次全会作出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习总书记主政浙江期间最重要的一项文化决策，这个《决定》进一步把准了浙江文化建设的方向，擘画了浙江文化工作未来的发展蓝图，在浙

江文化建设历史上具有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可以说，习总书记以“三个力”为方向，以“八项工程”为抓手，以建设“四个强省”为目标构建的“3+8+4”框架，就是撑起浙江文化建设宏伟大厦的“四梁八柱”。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当年省委的这一《决定》，至今仍对浙江的文化建设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为制定浙江文化发展战略开展调研的情况。

杨建新：习总书记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关于文化建设的思路和决策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建立在扎实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基础之上的。可以说，调研工作贯穿了习总书记在浙江工作的整个过程。更难得的是，每一次调研，他都不是随便走走看看，而是在特定的时间节点、特定的背景下进行的有重点、成系统的调研。关于文化建设方面，习总书记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共有4次系统调研。这4次调研我都参加了。

第一次系统调研的主题是文化体制改革。2003年6月，浙江被确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中央要求浙江先行先试，承担起为全国提供文化体制改革经验的重任。当时，整个浙江文化系统对改革的认识很不统一，思想很不稳定。文化事业和工业生产有所不同，不仅要有硬件支持，更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大家担心文化体制改革影响到切身利益，因而积极性不高。基于这个情况，为了把中央的要求贯彻落实好，7月，习总书记带领相关同志先后到浙江图书馆、杭州翠苑电影大世界、良渚文化博物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浙江曲艺杂技总团、浙江歌舞剧院等单位开展了为期一周的系统调研，并于7月18日召开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专题座谈会。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再次听取了文化工作者、演职人员以及相关的情况汇报，并发表讲话，详细阐述了他对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些想法。他首先定下基调：“中央把浙江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综合试点省，对浙江寄予了希望，要求浙江积极探索不断总结，试出经验、试出成绩，为全国作出新贡献，所以我们要积极贯彻，认真响应。”他阐述了文化体制改革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我们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习总书记还指出，改革的重点就是三个：抓好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抓好经营性文化产业改革和发展，抓好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他要求我们：要大胆探索，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找准改革的切入点。试点工作要大胆尝试，加大力度深入探索，中央有要求的都要做到，没有要求的也要大胆地试，在改革问题上，浙江要敢为天下先，走在全国前列。同时，具体实施过程中要稳步推进，以点带面，扎实稳妥，尊重规律。改革不是目的，改革是手段，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改出活力，改出文化生产力。

习总书记开展这次调研的时候，我刚到文化厅任职时间不长。听到他的讲话，很受启发和鼓舞。感到他的话，都说到了点子上，也说到了我们文化工作者的心坎里。改革首先要明确为什么要改？要搞清目的和手段的问题，同时，改革也不能只是下达任务，重要的是要解决方法和路径的问题。习总书记提出的文化体制改革思路，方向正确，系统全面，重点突出，尊重规律。不光讲认识，讲“过河”的目标任务，同时也讲方法，讲如何解决“船”和“桥”的问题。更加难得的是，他全面而辩证地提出了要“维护人民群众文化权益”这个理念。他认为，满足人民群众享受文化、参与文化的精神需求，是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重要体现。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习总书记在全国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尚未推开之前，就能有这样的深入思考和整体布局，真是远见卓识，很不简单。

习总书记的第二次系统调研是围绕第七届中国艺术节的筹备工作以及重大文化项目的建设展开的。2004年举办的第七届中国艺术节，是浙江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办的最高层次最大规模的文化艺术节庆活动。习总书记非常重视这次艺术节，指示要把它办成一届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艺术节，不仅影响要大，而且体制机制要创新。他几次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了解艺术节筹备情况，还多次在会议上对艺

术节的筹备工作作出具体指示。当时，尽管省财政有专项拨款，我们发动社会力量也筹措了部分资金，但还是有不小的缺口。不得已，我向习总书记求助，希望他能出面，向中央财政争取一部分经费。习总书记非常讲政治、守规矩，他首先就问我：“我出面要钱合适么？”我就赶紧给习总书记解释说：“毕竟是国家艺术节，中央财政担负部分经费是历届艺术节的惯例，另外如果争取不到经费，不仅影响浙江这次艺术节的举办，对下一个举办省份也会产生影响。”后来他给财政部领导写了信，争取到了这笔经费，为第七届中国艺术节的成功举办奠定了资金基础。

2004年8月6日，习总书记亲自到西湖文化广场、杭州大剧院等地视察第七届中国艺术节的筹备工作和演出场馆的建设情况。当时全国正处于经济调整时期，浙江的经济形势也面临困难，很多基建项目都压了下来，社会上对于西湖文化广场这类项目是否继续推进也有不同声音。我们这些“业内人”很担心，浙江多少年了，好不容易有一个大的文化项目，要是撤下来就太遗憾了。那一天，习总书记先是冒着酷暑，视察了西湖文化广场的工地，慰问了正在施工的工人，给他们送去了毛巾、矿泉水等劳保用品。随后，在现场召开的办公会上，我和有关同志汇报了艺术节的筹备工作。习总书记谈了三点：“第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更加关爱和善待广大民工；第二，在基建项目上要坚持有保有压，西湖文化广场作为重点文化工程项目，不但不能下，而且要保质保量，加快推进；第三，要以强烈的紧迫感、责任感和机遇感努力办好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充分体现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的办节宗旨。”习总书记对办好艺术节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当时还有一件事，在原先的西湖文化广场建设规划中，浙江展览馆是列入拆除的，后来还是习总书记最终拍板，调整规划，将这座上世纪70年代杭州市的代表性建筑（当时叫红太阳展览馆）保留了下来。现在，这个展览馆仍是浙江省最重要的展览场馆之一。

当时我听了习总书记在现场办公会上的表态，特别是后来他力排众议，将上世

纪70年代红太阳展览馆这座历史建筑保留下来时，我一方面感动于省委主要领导对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感到压力更大了。习总书记这么关心文化工作，给我们这么多支持，我们应当按照他的要求，真正把这届国家艺术节办好。所以当时我们真的是盱食宵衣，日夜奋战。2004年9月10日，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在杭州开幕。开幕式上，原计划由习总书记宣布开幕，因为习总书记提出要创新，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陈晓光同志提议，可以让普通群众上台宣布开幕，习总书记认为这个办法好，体现了“人民的节日”的宗旨，立马拍板决定，由一位银发飘飘的耄耋老人手牵一位稚气十足的红领巾小女孩上台，敲响了开幕式的大锣。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得到了广大群众和媒体的广泛赞誉。

此次中国艺术节历时17天，活动遍及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嘉兴等多个城市，最终于9月26日在绍兴圆满落下帷幕，无论是参加人数、演出剧目、举办活动的门类还是社会影响、社会筹资和赞助等方面，均创造了艺术节的历史第一。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实现了让人民广泛参与其中，享受艺术带来的欢乐，真正成为“人民的节日”，为国家艺术节的举办开创了全新的模式和路径，提供了很多新鲜经验。艺术节闭幕后，文化厅向省委省政府和文化部提交了总结报告，习总书记在报告上作了批示：“这次第七届艺术节举办得很成功，文化厅以及有关市县、相关部门精心筹划、周密安排，做了大量具体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对同志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希望文化厅以这次七艺节的成功举办为契机，总结经验、积极探索、乘势而上、加快发展，为繁荣文化事业、推进文化大省建设作出新的贡献。”习总书记在批示中，把艺术节的成功举办归功于文化厅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事实上，没有习总书记在各项筹备工作中细致入微的指导，没有他在经费上的关心支持、在方向方法上的具体指引，第七届中国艺术节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功的，他才是这次盛会得以圆满成功最关键的人。

第三次系统调研活动是在2005年，这一年在浙江文化发展的时间轴上，是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习总书记结合 2000 年出台的《建设文化大省纲要》实施情况，亲自主持了省委关于文化大省建设的调研课题。这是一次深入系统的全面调研，调研涉及省、市、县三级，时间跨度将近一年。可以说，这次文化调研层次之高、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影响之广、成果之丰，是我省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习总书记在调研中形成的思想、观点和科学论断，为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奠定了基础，对浙江后来的文化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2005 年 4 月 7 日至 15 日，我跟随习总书记先后考察了浙江艺术职业学院、中国丝绸博物馆、浙江舞台设计研究院、浙江文艺音像出版社下属的天创光电有限公司、萧山跨湖桥遗址等单位。所到之处，习总书记边看边问，详细了解。在浙江艺术职业学院，习总书记跟一位加拿大籍的舞蹈老师交流艺术人才的培养问题。在浙江图书馆，他详细询问了数据库建设情况，并通过数据库检索自己在清华读博时的论文。在丝绸博物馆，他提出要弘扬中国的丝绸文化，还指示省委接待办要把丝绸博物馆列为重点接待参观单位。在跨湖桥遗址博物馆，他认真听取考古发掘文物的保护技术。通过几天的实地走访、听取介绍、翻阅资料以及与基层同志沟通交流，习总书记随后在 6 月 1 日召开的浙江宣传文化系统调研座谈会上，阐述了他对浙江文化建设的看法和思路。习总书记讲道：“繁荣文化事业，壮大发展文化产业，是建设文化大省的重要目标，也是加快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标准。从浙江实际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研究、论证和抓好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重大工程建设，不断增强构成浙江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他还强调：“推进文化大省建设，一要进一步增强文化精品的创作生产能力，二要进一步增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三要进一步增强文化产业竞争能力。”

为了集思广益，那年 6 月下旬，习总书记专程率队走访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单位，并于 6 月 22 日在北京召开加快浙江文化大省建设恳谈会，还与中国社会科

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意向书，目的是凝聚各方力量为浙江文化发展大计出谋划策。最后，习总书记主持的调研组向省委递交了《文化大省建设的现状与对策研究》调研报告，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思路、发展目标以及主要对策都做了深入研究，并提出明确可操作的意见。这些调研成果，后来都体现在省委全会的《决定》之中。

第四次系统调研在2006年。那年的6月10日是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浙江杭州成为第一个承办“文化遗产日”主场活动的城市。这次系统调研的主题就是文化遗产保护。那天，习总书记先后考察了杭州南宋御街遗址、浙江省博物馆、杭州文澜阁修缮工程，还参观了浙江省博物馆的工艺美术大师和民间收藏珍品展览，随后在浙江省博物馆接待室召开座谈会。会上，我向习总书记汇报了全省文物工作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情况，并告诉习总书记：“我们浙江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我敢‘大言不惭’地对您说。”我之所以这么说，主要还是基于省委省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因为2005年可以说是习总书记工作日程上的文化遗产保护年，这一年中，他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批示、指示不下20余次。特别是在2005年5月到6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有6次批示。在这样高密度的关心、督促下，我们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怎么能干不好？习总书记听了我的汇报，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肯定了我们的工作，随即又就此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他指出，城市化率不断提高意味着农村变城市，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隐藏着对文化遗产进行破坏的危险，在现实中就存在着对城市文化个性的轻视甚至埋没，造成文脉的断裂，造成“千城一面”的现象。习总书记特别强调，在发展经济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要在建设过程中把那些具有文化价值和地方特色的历史建筑破坏了，要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要求出发，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管理、利用的关系，加快抢

救速度，加大保护力度，抢救为主、保护第一，切实保护好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最后，习总书记动情地说道：“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事，要动员全社会共同传承保护好中华文化，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关心和爱惜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财富，我们民族的精神和独特的审美情趣、独特的传统气质，才能传承下去。今天是我国首个‘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日’的设立凸显出文化遗产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们要借此机会，组织和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努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氛围，进而更好地熟悉中华历史，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文化，不断激发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这让我想起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发出了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号召。现在想来，这也是他在浙江建立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一种延伸。浙江人民不会忘记，如果不是他当年这么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也许今天我们再想找回“村口那条小路、村里那口池塘、村头那棵大樟树”，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陪同习总书记调研，我很有感触，他在调研中充分体现了他开展工作的方法论。一是突出问题导向，针对性很强。从调研时机的选择，到调研主题的选定，再到调研方式、内容的确定，全都做到把握得当，从来都是有的放矢。二是深入细致，贴近实际。每次调研，习总书记都会提前做充分准备，我们给他提供的材料，他事先都会仔细地阅看。调研期间，他会抓住关键提出问题。尤其喜欢到基层现场去走一走，与普通群众包括教师、演员、职工或学生坐下来拉拉话，甚至到老百姓家里去看一看。三是高屋建瓴，善于提炼。他在调研中不是随便走走看看，而是非常善于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每次调研走访、听取汇报后，他都会安排座谈，有时候现场座谈还不够，回到机关还要再召开座谈会或总结会，直到把问题谈透为止。也正因为如此，习总书记总能够“跳出浙江看浙江”，从调研中看到别人没

看到的问题，发现别人没发现的契机，所以他的讲话立意都很高远，既深刻，又富有前瞻性。四是辩证全面，指导性强。他发表的讲话、给出的意见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即便是调研当中的即兴讲话，也总是与他的整体思想首尾贯通、一脉相承；即便是谈再小的一个问题，也总是辩证地看、全面地看，对实际工作指导性很强。能有幸陪同他一起调研，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杨建新：可以说，习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为我们树立了率先垂范的榜样，令我们这些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感佩不已。习总书记特别看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强调不能“造成文脉的断裂”。我刚才讲到，习总书记曾经在2005年5月到6月28天的时间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出6次批示。第一次批示是2005年5月4日，此前国务院办公厅下达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习总书记看后给我批示：“建新同志，我省也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同一天，他又在省政协文史委《关于浙江民间手工艺保护、开发和利用情况的调研报告》上批示：“浙江的民间工艺是祖国艺术宝库的奇葩，应注意保护与传承，在文化大省建设中要加强这方面工作。”第三次是5月11日，当时一位并不认识习总书记的民俗研究学者写信给习总书记，反映浦江县高登山古村落文化遗产急需抢救和保护。习总书记将这封信批转给我。同一天，还批给我另一封非遗保护工作者的来信。第五次是5月16日，习总书记在我们当时提交的《关于浙江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汇报材料》上批示：“我省民族民间艺术保护工程启动三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下一步要按照‘国办发〔2005〕18号’文件的要求，认真总结，加强宣传，认真实施，扎实有效地做好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第六次是2005年6月2日，习总书记在永嘉县委县政府关于抢救振兴永嘉昆剧团的报告上批示：“永昆的保护应列入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计划之

中。”批示还特别指明请当时的省委秘书长李强同志协调，要我对这项工作进行研究落实。

习总书记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批示远不止这些，但一个省委书记，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对这么一项工作持续地给予批示，以前我从来没听说过。当时，习总书记的这6次批示在全国传为佳话，文化部的领导对我说：“老杨，你们有个好书记啊！这样你的工作就好做了。”到北京开会碰到兄弟省文化厅的领导，大家也都说：“老杨，你们习总书记那么重视非遗保护，难怪你们的工作开展得那么顺，那么好。”大家都羡慕我们有一个如此重视文化的省委书记。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习总书记不仅给出批示，而且是全方位地给予关注和支持。越剧是浙江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也是浙江省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6年是越剧诞辰一百周年，我们向省里打了一个报告，想借越剧诞辰百年之际举办系列活动，打出越剧品牌，振兴浙江戏曲，对外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对内鼓舞士气，增强文化自信。习总书记得悉后非常赞同我们的设想，全力支持我们举办越剧百年诞辰相关活动。活动期间，习总书记亲切会见了以袁雪芬为代表的老一辈著名越剧艺术家，并在3月27日越剧诞辰百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越剧艺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浙江人民一笔宝贵的财富。繁荣发展越剧艺术事业，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要求广大越剧工作者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崇高职责，自觉地承担起作为中华文化及浙江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创造者的历史责任。他还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文艺工作的新规律新特点，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按照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总体部署，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作为文化发展的价值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形成多出精品、多出人才、多出效益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了习总书记的鼓励和支持，我们趁热打铁，在2006年10月，提请省政府与文化部合

办“中国越剧艺术节”，得到了文化部的支持。在首届越剧艺术节开幕式上，习总书记讲道：“我们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建设和谐文化的实践中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积极推动越剧艺术乃至浙江文艺事业不断取得新的发展。人民创造艺术，艺术属于人民，衷心祝愿中国越剧艺术节圆满成功。”也正是在习总书记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中国越剧艺术节永久落户浙江，在提升越剧设施建设、繁荣越剧舞台艺术、培养越剧人才的同时，也对文化大省建设起到了引领带动作用。

除了越剧之外，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也是浙江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唯一的陶瓷类项目。2005年，习总书记到龙泉县调研，县委领导同志“小心翼翼”地提出，希望建一个像样的龙泉青瓷博物馆。为什么说是“小心翼翼”呢？因为龙泉是个山区欠发达县，缺钱。习总书记在听了县里同志汇报后，明确提出龙泉青瓷是民族文化的瑰宝，有必要建一个青瓷博物馆。在习总书记的关心下，省财政部门为龙泉县解决了1000万元的补助资金，帮助龙泉县启动了青瓷博物馆建设。博物馆建好后，龙泉县委在博物馆前面立了一块大石头，上面刻了“关怀石”三个大字。石头背后，刻上了习总书记关心支持博物馆建设的文字。那年我到龙泉去，当时的县委书记就对我说：“杨厅长，我们真不是搞个人崇拜。立这块石头的时候，习总书记已经调离浙江了，也还没有当国家领导人。我们就是想表达基层百姓的心情，因为我们非常感恩。龙泉县是一个山区县，财政很紧张，没有习总书记的支持，我们根本不敢想建这么一个博物馆，龙泉青瓷文化也就得不到很好的弘扬发展。”现在，龙泉青瓷博物馆建筑面积一万多平米，是省内最好的县级博物馆之一。龙泉青瓷产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还有一次是2006年3月，绍兴大禹陵祭典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全靠习总书记的支持。当时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已经初步确定，而绍

兴的材料还没有上报到北京。情急之下，我带着绍兴文广局的负责同志在3月20日那天一大早就到省委办公楼门口“堵住”习总书记，一方面向他作检讨，因为确实是我们的工作没跟上；同时恳请习总书记能出面跟文化部争取一下。第二天，习总书记就给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同志写了信，信中写道：“大禹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浙江精神的重要内涵”，希望文化部“能够将大禹陵祭典活动补报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使作为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大禹陵祭典活动和大禹精神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弘扬。”因为这封信，大禹陵祭典活动得以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外省的文化厅同行得知这事都很感动很惊讶，有的还专门打电话来问我：“老杨，这事你都敢找习总书记？这么具体的事情他也关心？”我说：“我经常找啊，习总书记关心文化的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他们听了都感佩不已。

浙江是戏曲大省，业内有“一部中国戏曲史，半部在浙江”的说法。浙江的所有戏曲剧种，都已纳入非遗保护。习总书记对戏曲艺术很关心，认为戏曲是地域传统文化的代表。他在跟我交流中间，有几次提到省小百花越剧团。小百花是浙江国办院团的领军团队，也是越剧艺术的代表性剧团，有一次习总书记还特别交代我：不光要重视小百花，其他各个剧种都要关心，要注意整体推进舞台艺术的繁荣。除了亲自参加越剧诞辰百年纪念活动和中国越剧艺术节并作重要讲话之外，他对浙江的戏剧发展和人才培养曾经有过多处批示。2004年12月，正逢浙江小百花越剧团20周年团庆，习总书记在12月18日发了贺信，说：“希望你们继续发扬敬业、奉献、合作的小百花精神，大胆创新，勇于超越，创作出更多的艺术精品，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设文化大省作出积极的贡献。”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是浙江重要的文艺人才培养基地，也是当时浙江艺术教育的最高学府。2005年11月1日，恰逢艺术职业学院暨浙江艺术学校50周年校庆，习总书记又发去贺信，充分肯定学院为我省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优秀艺术专业人才，希望师生们“抓

住机遇，加快发展，突出办学特色，提高教育质量，为浙江加快文化大省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006年9月，浙江昆剧团新创昆剧《公孙子都》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初选剧目。昆曲是中国目前留存最古老的剧种，有600多年历史。2001年作为我国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第一个项目，全国当时硕果仅存的只有6个半昆剧团，浙江有1个半。浙江昆剧团又是中国昆剧界的代表性剧团，1956年以一出《十五贯》使濒临消亡的昆曲重新焕发生机，毛泽东、周恩来都看过这出戏，还有很多评论。我很希望习总书记能来看看浙昆的演出，但又怕他太忙，所以就在9月7日给他写了一封信，问他能不能够给剧团写几句勉励的话，最好能来看一次演出。习总书记收到我的信，当天即批示：“可以发贺信并争取观看演出”。9月25日，正好是浙江昆剧团建团50周年，习总书记发来贺信，向为传承和发展昆剧艺术作出积极贡献的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并表示：“浙江昆剧团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昆剧艺术表演团体，为弘扬中国传统昆剧艺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希望浙江昆剧团与时俱进，再接再厉，不断续写新篇章，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浙江文化艺术增辉添彩。”而且真的在25日那天观看了演出，对浙江的戏曲工作者鼓舞很大。

接下来就是2006年底了。那年是浙江婺剧团成立50周年，婺剧也是浙江的主要剧种之一，400多年的历史，是浙江中南部地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剧样式。婺剧的唱腔非常丰富，有昆腔、徽腔、乱弹、高腔、滩簧、时调等，所以舞台表现力很强，加上婺剧团团风优良，常年坚持在乡村为农民群众演出，广受好评。我们很想习总书记能够关心一下这个剧团，习总书记知道后，欣然同意，在11月8日给浙江婺剧团发了贺信，对浙江婺剧团成立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并高度肯定婺剧团成立以来取得的成绩，希望他们“把握时代脉搏，突出浙江特色，多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为浙江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作出新的贡献”。

回想起习总书记的这些批示、指示，深深感受到他对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地方戏曲的重视和挚爱。

在习总书记关心关怀下，浙江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年一个台阶，成效显著，走在了全国前列。我们在非遗保护上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在全国公布的共四批计 1372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浙江有 217 项，占到 1/6，连续四批均名列第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浙江占 10 个，也是全国第一。这些并不是说其他省份的非遗资源比我们的少，而是我们在整理、发掘、记录、保护上起步比较早，工作比较扎实。在中央和地方媒体的大量报道中，“非遗保护看浙江”成为大家的共识，可以说，浙江在习总书记的带领下，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鲜经验和示范样板。

采访组：那习近平同志是怎样重视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杨建新：习总书记不仅关心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物质文化遗产（文物）的保护也同样一贯重视。以 2005 年为例，他关于文物保护的好多批示也都集中在这一年，我举几个例子说一说。2005 年 3 月，省人大有一份简报叫《来自旁听席的反映》，第五期刊登了一位旁听十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同志写的情况反映，题目叫《浙江古村镇古街区保护亟待加强》，看了这篇材料，习总书记于 3 月 3 日作了批示：“所提建议值得重视，请杨建新同志研究。”我立刻召集有关处室和文物局同志作了研究，并且把那位旁听人大会议的反映人周乾松同志请来，当面向他征求关于古村落保护的意见和建议。而后我们就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形成了文化厅部署意见，报给了习总书记。报告里面我也直言，这方面任务太重，经费不足，希望财政予以支持。习总书记收到文化厅的报告以后，在 3 月 29 日作了批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取得成绩，但保护任务繁重，形势仍然严峻，同意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政府财政支出应逐步加大对文保的支持。”习总书记的批示，对我们的工作是有力的支持。在他主政浙江期间，省财政用于文物保护工作的支出有了大幅

增长。又比如，我们浙江有一个著名的古建筑群——文澜阁，修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是清代收藏《四库全书》的皇家藏书楼。2005年4月，文澜阁修复工程进入最后阶段，《人民日报·情况汇编》刊登了《浙江文澜阁修复即将完工其文物功能亟待明确》的报道，这篇内参引起了习总书记的关注，他在4月5日批给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和我们阅酌。我立即和文物局、浙江省博物馆的负责同志开会做了研究。其实当时我们对文澜阁修复以后的功能定位已经有了设想和安排，我们讨论了以后，马上把已经考虑的设想书面报告给了习总书记。4月14日，习总书记看了我的报告，批示同意我们拟定的文化功能定位。

说到《四库全书》，当时乾隆皇帝命大学士纪昀组织抄了七部《四库全书》，其中四部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史称“北四阁”；三部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史称“南三阁”。《四库全书》因为战乱损毁严重，现只剩下四部。其中一部藏于国家图书馆，一部在国民党败退时带到了台湾，还有一部因当年中苏关系紧张为备战需要放到甘肃。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在太平天国时被洗劫焚烧，所剩部分散落民间。后来经过杭州的乡绅丁申、丁丙兄弟俩的搜集抄录整理，恢复大部，又经过民国时期浙江图书馆馆长钱恂、张宗祥组织的补抄，才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复原。由于丁氏兄弟在补抄《四库全书》时，不少是按照目录从民间找来原书进行抄录的，而纪昀在主持抄写的时候，对书中凡与朝廷皇家不利的地方都做了删改，所以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比起其他的几阁，内容更为完整真实，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2006年，杭州出版社提出计划影印出版《四库全书》文澜阁本，省文化厅和省图书馆给予了大力支持。《四库全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36300册，即6752函，汇集了中国古代大量的文献资料，可以说是中国历朝历代最集大成的一部古籍。这也就意味着影印出版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而且耗资巨大。习总书记很重视这项文化工程，于2006年9月27日专门批示：

“文澜阁本的四库全书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将其影印出版，这是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对我省开展的文化研究工程具有重要意义。原则同意将其纳入文化研究工程。希望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好，争取早出成果。”在习总书记的关心下，影印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现已由杭州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设计装帧印刷都不错。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又如，浙江当时还没有一处世界自然遗产或文化遗产，习总书记对此非常关心。2005年5月11日，他给我和杭州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批示：“我省在世界遗产申报方面尚属空白。‘申遗’是有许多条件的，也要下决心，花代价。不知是否做好了各种准备。”根据这个批示，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向省委省政府报送了《关于良渚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的报告》，就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的现状及已做的工作作了汇报，同时提出推进下一步工作的建议和设想。习总书记看了这个报告，于7月4日再次批示：“请杭州市委市政府继续推进保护和申遗工作。”到了2006年11月，省文物局简报《浙江文物要情》第七期发表了一篇信息：《浙江诞生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上山文化》，讲的是距今九千至一万年的浦江县上山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习总书记看了之后作出批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习总书记这些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批示意见，虽然不是全部，但也足以证明在习总书记的工作思路和工作布局上，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占有重要位置的。

还有一次，我印象中是2006年前后，金华市磐安县有一个古茶场即将被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习总书记得知后非常重视，专程去进行调研。这个茶场坐落在海拔600多米的山上，已有上千年历史，是中国南方农耕时代典型的茶叶交易市场，也是我国留存至今最为古老的茶场之一。唐宋以来，这里一直都是周边方圆百里的农民进行茶叶交易的中心，也是官府采购茶叶的地方。近代由于铁路公路的兴起，人流物流发生巨大改变，市场逐渐消亡，在茶场旧址就只留下茶

神庙、官府机构等部分古代建筑，但也都破败不堪了。习总书记去那里察看了茶场的现状，听取了县领导汇报，并与当地群众深入交流。当场就提出：“要维修保养好这个古茶场，充分发掘利用好它独特的历史人文经济价值。”在习总书记的关心下，省财政专拨 500 万元，对磐安古茶场进行维修。后来我再到这个古茶场的时候，维修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茶场周围的古戏台、茶神庙等传统建筑都已经恢复。古茶场里还挂着习总书记当年视察的照片，看到照片上残垣断壁的旧址，再看看修复后的古茶场，作为文化工作者我们都很感动。没有习总书记的重视，这个古茶场很难得到这么及时有效且高质量的维修保养。跟当地老百姓交流起来，他们都很兴奋地跟我说起习总书记当年调研时的场景。我打趣问道：“你们当时看到习总书记啦？”农民们都很淳朴，争先恐后答道：“当然看见了，我当时就在他边上！”然后就如数家珍地同我讲当时习总书记坐在哪里、脸朝着哪个方向、都讲了些什么话等等，每个人谈起来都觉得十分自豪和骄傲。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推动文化大省建设过程中，是怎样把握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

杨建新：习总书记在越剧诞辰百年纪念大会上说过一句很有深意的话，正好回答你们的问题。习总书记说：“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人民群众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与经济发展交融贯通、相得益彰，影响着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记得习总书记不止一次在会上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在习总书记心中，文化建设事关人的全面发展，事关一个国家民族综合竞争实力的强弱，从来都是一个战略问题。他不是孤立、静止地看待文化建设工作，而是把文化建设放到发展的大环境中，辩证地看待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当时有个著名的论断，就是“一个烦恼和多个烦恼”的问题。习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讲过：多年来，我们被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这么一个烦恼困扰。现在经济发展了，温饱问题逐步解决了，老

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就会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就会产生多个烦恼。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靠文化。他还引用一位哲学家的话说：“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简简单单一句话，把文化建设与其他工作之间的关系阐述得既鲜明又深刻。

习总书记对文化的重视，不仅体现在认识上高人一筹，而且体现在用人上识人善任。他在一次大会上讲过：“今后我们用干部，就要用真正懂文化的干部。”当时我就想，现在的干部论学历、论文凭，谁都不缺，可见学历、文凭不等于真懂文化。习总书记的话，体现了他对干部人文素养的重视。

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化工作在对外开放和交流中的引领带动作用，习总书记大力推动浙江文化“走出去”。他主政浙江的五年，是浙江文化大踏步走向世界的五年，在这方面，他是身体力行，亲力亲为。2004年，他率浙江省代表团出访法国，同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签订了文化、经贸合作交流协议。次年10月，根据协议，我们省文化厅组织到法国举办“感受浙江——法国·中国浙江文化周”活动。当时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主要还是在国家层面，地方对外交流的重点往往放在推动经贸、旅游上，浙江是第一次在国外举办这样的大型文化活动，缺乏经验。在习总书记的鼓励指导下，我们在法国布置了一个“天上人间——中国浙江丝绸文化展”，还办了一个“水乡烂漫”浙江农民、渔民画展，把嘉兴农民画、舟山渔民画以及长兴百叶龙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表演带了过去。文化周开幕前一天，习总书记专门发来贺电：“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中国和法国在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两国人民分别创造了璀璨绚丽的中华文化和法兰西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加强中法文化交流是我们共享人类文明成果、促进相互学习借鉴、密切双方友好交往、携手创造美好未来的有效载体和桥梁。愿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树常青。祝‘感受浙江——法国中国浙江文化周’圆满成功！”结果这次活动举办得很成功，在当地引起轰动。从法国回来

后，习总书记在我们的总结报告上批示：“这是一次成功的对外宣传与友好城市文化活动，应总结推广，今后继续有计划开展。”在习总书记的推动下，我们将这个对外交流项目保留了下来，并改名为“浙江文化节”，持续加以推进。迄今为止，我省已经在将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 23 次系列活动，使“浙江文化节”成为浙江文化走出去的一张金名片，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口，为展示浙江的品牌形象提供了一个平台，为浙江经济走向世界搭起了一座桥梁。

同样是 2004 年，习总书记到丽水市遂昌县进行调研。遂昌是一个欠发达的山区县，当年汤显祖在这里当过 5 年知县，也正是在这里写出传唱千古的《牡丹亭》，还留下了很多亲民廉政的故事。习总书记清楚地知道这其中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就在调研中要求县里领导“注意挖掘和弘扬汤显祖文化”。遂昌县马上行动起来，和我们一起商量如何落实习总书记的指示。县里很快出台了为期十年的《汤显祖文化发展规划》。而后，省文化厅支持遂昌县围绕汤显祖文化做了许多工作。英国的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是同一时期的伟大剧作家，而且同在 1616 年逝世。我们就专门派出浙江昆剧团会同遂昌代表团出访英国，把《牡丹亭》带到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夫德镇，同那里的人民开展演出交流活动。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精心创排了《寇流兰与杜丽娘》，把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笔下两部戏的两个主要人物跨越时空合编到同一个舞台上，远赴莎翁故乡进行演出，同英国的艺术家切磋交流，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直到 2015 年 10 月，习主席出访英国，他还惦记着这件事，在演讲中他说：“明年是他们（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 400 周年。中英两国可以共同纪念这两位文学巨匠，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为此在 2016 年，中英两国举办了隆重纪念两位世界文学巨匠的文化交流系列活动。这又是一段在习总书记推动下，延续了十几年的中外文化交流佳话。

采访组：就您的亲身经历，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杨建新：我有幸在习总书记领导下工作5年。在这5年里，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他的亲和、博学、严谨、自律、重情重义，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他身边，我也常检视自己的不足。我觉得习总书记的个人风格就是亲近、平和、沉稳，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任何时候他都给人成竹在胸的印象，从没看到他喜形于色或声色俱厉的样子，所以我们在他领导下工作有压力但不紧张，加上年龄相仿，都有知青经历，所以在他面前我敢于直言，愿意说真心话。不少工作汇报和请示我是以个人名义送的，目的还是为了得到他的重视和支持，他全都有批示。接触多了就会觉得习总书记还是一个深沉、内心世界很丰富的人，他看书很多，涉猎很广。尤其是文化建设，他想得很多、很深。他对文化工作者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后来看到媒体报道他在河北正定当县委书记时，与作家、文化局长贾大山的深厚友情的故事，回想起与习总书记交往的点点滴滴，更加体悟到这一点。

习总书记对工作要求很高，作风严谨是出了名的。我觉得在他身上同时具备两种素养，在大事上、在决策时，他是举重若轻，高瞻远瞩；在具体工作中、在抓落实上，他又是举轻若重的，甚至是耳提面命。如涉及到重大文化活动和重大文化事项，他都具体过问，详细布置，对每一个重要细节都不放过。第七届中国艺术节、越剧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等就是这样，所有重要环节步骤，他都问得清清楚楚。举个例子，那一年，习总书记一位特殊的朋友——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朱马利专程来杭州拜访他。根据外交礼仪，习总书记交代我们安排一场专场文艺晚会。在晚会上唱什么歌，演哪几个节目，顺序如何排列，都是习总书记一一审定的。

在杭州城建一个一流的美术馆，是浙江人民的夙愿，这也是在习总书记的直接关心指导下才得以实现的。2003年1月31日，正好大年三十，习总书记冒着寒风细雨到西湖边进行实地踏看。在随后召开的现场座谈会上，他详细听取了汇报，还把几个选址方案的图纸一一作了认真比对。最后他拍板决策，浙江美术馆上马，选址就定在西湖边上。而且对美术馆的方案设计，他也亲自过问提出指导意见，

认为美术馆建在西湖边上，就应该“穿中式服装”。我是在这次现场会一个月后到任的，一到文化厅，就研究这事。当时，我和厅里同志反复琢磨领会，怎么建一座“穿中式服装”的美术馆。最后，经过两轮招标，在32个方案中一再优选，同时发动杭州市民投票选择，最终定下方案报到省里。一般而言，这种具体的工程项目只要报省政府领导签字就可以了，没想到习总书记专门提交省委常委会，通过集体决策，把方案确定下来。在美术馆的奠基开工典礼上，又是习总书记亲自参加，按下了开工按钮。不久，李瑞环同志到浙江来，习总书记还带着我专程去向瑞环同志汇报美术馆的设计方案，听取他的指导意见。在习总书记细致入微的指导下，浙江美术馆的建设取得了圆满成功，中国美术馆要修建新馆，还派人来我们这里实地考察，汲取经验。唯一遗憾的是，美术馆建成之时，习总书记已调离浙江，至今他还没来看过，我们都很盼望他能来看看，不过我们也很努力，没有辜负习总书记的期望。美术馆办得不错，各项工作都比较出色，现在是全国重点美术馆。习总书记来了，美术馆可以向他交出一份有分量的成绩单。

习总书记的工作风格不仅体现在工作中，也反映在生活的点滴之间。他喜欢文学艺术，有很高的鉴赏水平。除了看戏之外，他也会每隔一段时间，安排看一次电影。一般每次两部，一部国产的，一部进口的。观看之前，他秘书都会来要相关资料，包括电影名称、片长、故事梗概、主要演员、生产片商甚至放映顺序都要求得清清楚楚。在两场电影放映的间隙，习总书记还会根据影片内容和背景信息，联系电影生产、艺术创作等问题同我们交流，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实际上他是把看电影也当成了文化调研。有时彭丽媛同志也会来，这时候，习总书记还会特意让秘书通知我们也可以带家人一起去看。

时间长了，我深感习总书记是个很重情义的人。有一次，他让秘书通知我，晚上参加一个接待活动。到了现场一看，只有两位北京来的客人。习总书记指着一位长者向我介绍：“这是我在河北正定县工作时的一位老领导，当时对我的工作很

关心，给我很多支持。他是一个文化人，所以我特意请你来作陪，一起交流交流。”这位老领导知道习总书记喜欢看书，专程带来一大摞书，一本本仔细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习总书记。从他们的举止言谈中，我能感受到他们在工作中结下的深厚友谊，确实让人感动。还有一次，我陪同习总书记接待一位北京来的同志，是个局级干部，看大家有点不解，习总书记特意解释：我们都是一起在福建工作过的老朋友了，当时他是中央媒体常驻福建的记者，对福建的工作帮助不少。这样的事例很多，有些是我亲历，有些是听说。只要是在工作中共过事的老同事、老战友、老朋友，他都不忘旧情，他们到浙江来，只要有时间，习总书记都会出面接待或看望。

说实在的，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文化工作是处于边缘化的，即使在会上或文件上提得很高，但实际工作中很难被真正重视。从某种意义上也好理解，过去国家穷，急于发展，经济是第一位的，文化既不能吃，又不能穿，还要花钱，要被重视也难。我作为文化厅厅长，在这方面感触良多。但习总书记主政浙江那几年，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让我们这些文化工作者信心倍增。他主政浙江的5年，是浙江文化建设经费大幅增长的5年，是浙江文化发展状况发生转折性变化的5年，也是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的5年。正是在习总书记的领导下，由于省委省政府的重视支持，浙江的文化建设大步跨越，奠定了我们在全国文化工作当中的前列位置。习总书记离开浙江的时候，我省文化建设的多项重要指标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名列前茅。

现在我还时常回忆起在习总书记领导下工作的那段日子，当我离任文化厅长时，厅里同志送我一本相册作为分别礼物，那里面有不少我陪同习总书记调研考察的照片。看着那些照片，脑海里便会浮现习总书记对浙江文化工作精心指导的所言所行，耳旁似乎会响起他对文化建设提出的种种真知灼见。他对文化厅工作要求很高，我们工作都很累很辛苦，但能在他领导下投身于浙江文化事业，见证发生着的崭新而深刻的变化，我们都感到幸运和自豪。转眼习总书记离开浙江都十年了，

但在他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的经历，将成为我永久的美好回忆。

来源：《学习时报》2021年3月24日

“习总书记把外事工作当作浙江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

——习近平在浙江（十九）

采访对象：阮忠训，1952年7月生，上海人，曾任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2003年6月任省政府外事办主任、党组书记兼省友协常务副会长。2019年6月退休。

采访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政

采访日期：2017年9月19日

采访地点：杭州市大华饭店

采访组：阮主任，您好！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期间很关注外事工作，他对外事工作有什么要求？

阮忠训：我2003年6月到省外事办当主任。在习总书记任省委书记的4年多时间里，我感到他对外事工作非常重视，给了我们很多支持。一般来说，在省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是摆在首位的，很少会在外事方面下力气，大多是把外事作为一项普通的行政服务职能来对待。但习总书记很不一般，他对外事工作要求很高。他说，浙江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时间比较早，范围比较广，程度比较深，要做到地方外事工作服从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体制机制优势，形成政治与经济、政府与民间、中央与地方的立体交叉外交，进一步提高浙江对外开放水平。习总书记对浙江外事工作的这个定位，成为我们开展地方外事工作的重要指导。

习总书记要求浙江打造外事工作的三大品牌。一是优质外事。习总书记经常对我们强调，外事无小事，外事工作部门要坚持以优质服务为目标，一方面要完善涉外工作协调机制，及时妥善处理好各类涉外突发事件；另一方面要利用外事渠道

广交朋友。他亲自签约的友好省州就有好几个，如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摩洛哥拉巴特大区、美国新泽西州、澳大利亚西澳洲。习总书记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在外事工作上要求我们一定要细之又细，有时他比我们还要细致。我们上报的外宾接待计划他都看得很仔细。有一次接待一位中东的伊斯兰教国家外宾，他看到菜单上面有酒，马上提出，伊斯兰教国家应该是不喝酒的，怎么能安排酒呢？我当时就一阵脸红，这是我们工作的疏忽。他还要求我们每个环节都要把好关，包括以省委省政府名义赠送的礼物。记得我第一次陪他出国的时候，他把所有的礼品一一看过，了解这个送给谁、那个送给谁，做到心中有数。一个省委书记能把所有的礼品都看过，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二是诚信外事。当时，浙江有 100 多万人在国外，确有少数人不太诚信，签证材料造假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外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提出我们的签证材料可信度不高，对我们浙江的形象损害很大。习总书记知道以后，觉得应该把这件事当成一件大事去解决。他提出，要把“信用浙江”建设贯穿于外事工作之中，认真抓好《关于对驻外使领馆管理若干规定实施细则》的贯彻落实，加强外事工作部门与外国驻华使领馆的诚信交往，提升工作水平。在习总书记的亲自指示下，我们每年都赴上海举办浙江省情介绍会，请各国驻上海总领事参加。同时也邀请各国驻沪总领馆官员考察浙江，与相关部门座谈，了解我们外事签证过程中的诚信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怎么解决，从而进一步健全了与外国驻华使领馆的磋商机制。渐渐地，我们通过建立制度、规范程序、严格把关，有效治理签证申请中的材料作假等问题，建立和完善因公证照收缴保管工作检查机制，推进证件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浙江外事工作把“信用浙江”的品牌打响了，签证通过率每年都超过 97%，我们外事办与各国驻沪总领馆也建立起长期互信的关系，为浙江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很好的服务。

三是经济外事。作为地方外事部门，与国外建立友好交流关系，经济问题是

总抓手。随着浙江经济国际化程度的加强，我们外事工作积极为经济建设服务，每次出访都是带着经济项目出去，带着合作项目回来，与友好城市之间的交流合作更加紧密，关系也变得更加融洽。浙江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很多民营企业都跟着我们一起出去，一种是原先就和外国相关方有合作意向的，另一种就是主动到国外寻找合作伙伴的。我记得习总书记在浙江提出经济外事一年多以后，外交部才提出经济外交，这充分说明习总书记的高瞻远瞩。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外事工作中有哪些具体做法？

阮忠训：习总书记来之前，我们没有外事工作的专报，我到外办以后，他要求我们建立外事工作专报，所有外宾来访都要通过专报反映给省委，这样就能够及时把握外宾来访的动向。

作为外办主任最难的事之一，就是外事活动中安排省领导会见外宾。领导同志一般日程安排很紧，一些会见工作难以做到一一出席，我们的工作做起来很是为难。但习总书记却从来没有推过，只要我们向他提出建议，他就欣然接受。他对我说：“只要你认为我需要见的外宾，我都会见，内事要给外事让路。”我刚到外办时，我们的友好城市是20多个，习总书记离开浙江的时候，我们的友好城市超过50个，好多都是他亲自签约签来的。

习总书记对我们说过，出国一定要有实质性的任务，出去见识一下无可厚非，但一定不要忘了出去的任务是什么。他自己身体力行，每次出访都硕果累累。每次出访快要结束时，习总书记都会在访问团内部召开总结会，每个人都谈谈出访的体会和意见，习总书记最后作一个总结。回来以后，习总书记都会召开常委会，把整个出访情况向大家说明，我们外事办的工作人员列席参加。他的讲话逻辑性很强，我们只要把他讲过的话稍加整理，就是一篇很成形的出访报告。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开创了在境外举办“浙江周”的做法。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阮忠训：习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经常在境外举办大型外事活动，一方面主动向世界展现浙江形象，另一方面搭建招商引资的平台，“浙江周”就是一个最典型、最成功的例子。我们先后在美国、法国、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举办“浙江周”，习总书记每一次都亲自带队，不仅与当地政府开展交流活动，还主动与当地各界的浙江商会、同胞见面座谈，积极帮助协调解决问题和困难，与大家心贴心、实打实地沟通交流，“浙江周”成为我们宣传浙江形象、开展外事工作的一个很好抓手。自从习总书记开创了这个载体之后，国内很多地方纷纷效仿。

2005年1月，习总书记带领我们先后到香港、澳门举办“浙江周”。在香港，习总书记指出，香港作为内地经济发展所需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要素的重要来源地，作为外资进入内地和内地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与平台，是浙江发展服务业的重要合作伙伴。CEPA（2003年中央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英文简称）的实施，为浙江与香港的合作带来了历史机遇，浙江要在CEPA框架下，创新合作机制，拓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水平。在澳门，习总书记指出，澳门成功的发展经验值得浙江借鉴。希望能借CEPA落实的契机，进一步推动浙澳两地的经贸合作，加强两地多个层次的交流。那一次“港澳·浙江周”共签订投资项目153个，总投资额62.58亿美元，包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萧山国际机场与香港机场管理局的合资项目。

在港澳两地，习总书记的会议活动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会见当时港澳地区的一些高层人士，如香港特首董建华、澳门特首何厚铨；二是签订许多经贸合约；三是与同乡会的成员座谈交流。习总书记不仅探望了一些在港澳的浙江乡亲，还看望了原来在福建时认识的一些商界老朋友。习总书记很念旧情，他和原来的朋友们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在港澳期间，来参加我们会议活动的有相当一部分是广东人、福建人，为宣传浙江、推动浙江招商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时我向习总书记提出，希望浙江能够单独设立一个省港澳办，因为在港澳的

浙江人很多，而目前没有港澳办，港澳这方面的事情没有专门的部门来管。他一听，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出访回来之后马上进行研究，并按程序成立了港澳办，与省外办合署办公，从体制机制上延伸了浙江外事工作的触角。

2006年，我们以“合作、交流、联谊”为主题在美国举办“浙江周”，开幕式上共签约63个投资项目，总投资24.9亿美元，协议外资10.2亿美元，其中投资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达28个。“浙江周”期间还签订了涉及旅游、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的合作协议20项，同时还举行了“2006美国·中国浙江文化周”活动。习总书记还带领浙江代表团参加了浙江省和美国新泽西州建立友好关系25周年的庆祝活动，与新泽西州州长科奇内进行友好会谈，确定将进一步在经贸、教育、物流、生物医药、电子等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并共同签署了拓展两省州友好关系的协议书。他还参加了纽新航港局（即纽约与新泽西港口事务管理局）与宁波舟山港合作协议的签约仪式，出席温州大学与美国肯恩大学合作创办温州肯恩大学协议书、浙江省民营企业协会等单位在肯恩大学设立中国企业家美国培训中心的合作备忘录等签字仪式，考察了美国一批大企业和财团，与高盛集团、花旗银行、纽约证交所、朗讯公司及贝尔实验室、摩托罗拉公司、联邦快递公司高层进行了会谈，出席我省有关单位与摩托罗拉公司、联邦快递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仪式。他向各界积极介绍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所到之处受到在美华人华侨的热烈欢迎，习总书记亲切会见了他们，鼓励他们爱国爱乡，为促进中美经贸合作交流作出积极贡献。

在美期间，习总书记会见了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佐利克致力于发展中美关系，试图解决美中两国在贸易和安全方面的分歧，提出了中美双方“利益攸关者”的概念，给布什政府及美国主流社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和策略。他和习总书记谈了很多问题，包括汇率、贸易顺差逆差等。习总书记也向他介绍了很多关于中国的变化与趋势，这次谈话对佐利克的对华立场问题影响很大。有一天，白宫

办公厅副主任为欢迎习总书记访美，专门在家里开派对，邀请了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人士，习总书记利用这个机会，拿着酒杯，主动和大家打招呼，向他们介绍中国和浙江的情况，增进美国各界对我们的了解。这又让我们回想起他经常说的“每一次踏出国门都要有实质内容”，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我还记得，当时保尔森还是高盛集团董事长，马上要到美国财政部当部长，他是个“中国通”，来中国 60 多次，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较多。习总书记见了他以后，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回来后没多久，保尔森到中国访问，在同国务院领导通话时说，他访问的第一站是杭州，国务院领导问为什么要去杭州？他说，我要去杭州看望一位老朋友，习近平。他同习总书记只是见了一次面，就认定习总书记是他的老朋友，充分说明习总书记的人格魅力。我们安排保尔森到西湖国宾馆入住，他和习总书记散步的时候，美国记者拍了一张照片，在美国各大报纸都刊登出来，影响很大。

那一次，习总书记在美国访问只有短短两天多时间，出席了近 20 场公开活动，非常密集，几乎是一场接一场。从早餐到晚餐都安排了活动，有时中午都来不及坐下好好吃顿饭，就直接拿着盒饭或面包，匆匆吃上几口，再赶去参加下一场活动。拜会的美国政要中，有的并不是很友好，我们担心会涉及敏感问题，习总书记说，越是有疑虑，甚至不友好的，我们就越要去做工作，让他们增加对中国的了解。有个别政要谈到汇率、中美贸易逆差、台湾问题以及人权问题等，习总书记都讲得有理有利有节有据，既有深度又有感染力，说得美国人心悦诚服。习总书记用他的行动示范我们，做外事工作不仅要交老朋友，而且要交新朋友，更要善于同意见相左的人打交道。

采访组：您怎样评价习近平同志经济外事的成效？

阮忠训：我刚才说过，习总书记把经济外事作为外事工作的重要内容，让外事为浙江经济发展服务，为浙江对外开放服务，这方面成效是巨大的。

除了“浙江周”等活动外，习总书记还率代表团到国外招商引资。2005年7月，习总书记率团访问了韩国，出席了“2005浙江（韩国）投资说明会”。投资说明会那天，习总书记作主旨演讲，整个会场座无虚席，连走道上都挤满了人。当天韩国各大商会协会、企业界500多人参加了投资说明会，现场浙韩企业签订了40个投资项目，总投资11.68亿美元，LG、SK等一批世界500强巨头与浙江企业签约。

随后，习总书记一路马不停蹄，先后考察了SK、晓星、LG、三星等多家大型企业。每到一家企业，他都介绍一遍浙江的投资环境，指出浙江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是中国发展势头最好、投资环境最佳的区域之一。习总书记吩咐我们，外资企业在浙江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重点关注，并及时加以解决。

正是在习总书记的推动下，当年世界500强之首的沃尔玛、浙江第一家外资银行日本三井住友、第一批外资保险公司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等国际500强巨头纷至沓来，浙江利用外资规模和水平不断提升。

2007年，也就是习总书记离开浙江这一年，全省进出口总额达到1768亿美元，比2000年翻了两番多，首次跨入千亿美元出口俱乐部；当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首次突破100亿美元，相当于2002年之前20多年之和。也是这一年，浙江核准在境外投资的机构达3039家，累计投资总额20.94亿美元，境外机构数居全国第一，星罗棋布于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采访组：您陪同习近平同志出访过很多国家，出访过程中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阮忠训：我陪习总书记出访过四次，他工作计划性很强，而且每次出访前都会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反复向我们了解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的情况，行程安排，包括要见谁、要谈什么项目等，出国之后严格按照计划执行。他自己还会提前把出访国家的国情、礼仪、文化等烂熟于心，所有事情都能做到心中有数。他告诉我们，

你们兜里应该有一个本子，记下出访国家的基本情况，出访中可能用到的信息，方便随时查阅，也能简单记点东西。从那以后，我们就随身带一个小本子，包括每天的日程安排，会见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物的基本情况、政治态度等，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而且沿用至今。

要说习总书记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非常能吃苦，而且从无怨言。我讲几个具体事例吧。有一次，我陪同他出访西澳洲，考察一个液化天然气项目。我们从西澳洲首府珀斯出发，乘坐一架小飞机，总共 20 多人，飞行两个多小时到达目的地。但没想到的是，这个荒岛上既没有机场，更没有跑道！飞机就是直接在沙滩上降落，回来的时候也是直接在沙滩上起飞，这是很危险的。还有一次出访老挝，我们登机以后，舱门都关了，突然通知我们飞机出现故障，要马上维修，让我们在机舱里等。结果一直修了一个多小时，机舱里没有空调，习总书记还穿着西装，全身大汗淋漓。后来总算到了目的地，来不及休息马上去参加活动。虽然我们在外事工作上做足了功课，但由于当时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原因，出现这种极端状况，确实令我们措手不及，也感到非常忐忑，觉得没有把习总书记的活动安排好。可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习总书记从来没有任何怨言，也没有指责过我们工作人员，反而经常用一些玩笑话宽慰我们。每次想到这些，我内心既感到内疚，又觉得十分温暖。

习总书记在外事出访活动中，总是表现出极强的人格魅力。我们出访澳大利亚时，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专门赶到悉尼与习总书记会见，一见面就对习总书记说，我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专门研究了浙江。原本设定半个小时的会见时间，两个人谈了 50 分钟，谈得非常好，而且越谈越投机。当时习总书记是省委书记，但我们在澳大利亚享受了国宾待遇，在澳大利亚期间，代表团的费用全部由联邦政府支付，并且还专门派两个贴身安保人员给习总书记做警卫。

习总书记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每次出访前，他都会和我“打好招呼”，到了

国外，当地人吃什么东西，我们就吃什么东西，不要特意给他找中餐。所以我有时候跟别人开玩笑说，陪习书记出访特别“轻松”。有一次我们途经复活节岛，当地“土著”的习惯是在地上挖一个坑，把土豆、玉米、番薯等放进坑里烤着吃。习书记就按照当地习俗也跟着一起吃，一点特殊要求都没有。在外事工作中，一些领导到国外出访，由于不习惯、不适应，提出相应的要求，或者拿国内的标准套到国外去，其实都是很常见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习书记却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更没有这样做过，都是入乡随俗。我们到任何地方，习书记基本不买什么东西，就算买东西也是买一些小纪念品，而且从来不让别人为他花钱，更不接受任何人送他个人的礼品，所有以政府名义赠送的礼品，回来以后全部让我们交给省委办公厅。

他对自己严格要求，对身边工作人员也是如此。有一次出访，习书记连着好几天参加了十几场活动，非常辛苦。一天中午，我们吃完午饭，距离下一场活动还有一个半小时，我心想，习书记太累了，这会儿至少能休息一个小时。没想到习书记对秘书说：“我休息一会儿，但半小时之后一定要叫醒我。”只有半个小时，他能睡好吗？我就跟他的秘书说，反正还有时间，一个小时以后再叫书记起来，让他多睡会儿。他的秘书有些为难，说这样不行，习书记起来以后一定会批评的。我说，没事儿，书记责怪，我来担着。一小时以后，习书记起来了，果然批评了秘书。他说：“我说休息到几点就是几点，我累一点，有什么关系？耽误了公务才是大事！”我赶忙上前帮他的秘书解释，可习书记仍然一脸严肃，可见他对工作人员和对他自己一样严格。

习书记是个非常重情重义、真性情的人。他对我说过：“我们到国外去，那些接待过我们的华人华侨如果到浙江来，一定要跟我讲，哪怕我没时间请他们吃饭，也要在办公室见见他们。”我能够体会到，习书记的这种态度是对我们外事工作最大的支持，他以真诚、亲和的态度接待这些侨领，不仅能够赢得他们的认

可与支持，而且他们回去之后广泛宣传一番，我们在国外开展工作就更容易更顺利了。习总书记说过，在外面出访，凡是答应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浙江和日本静冈县是友好省县关系，静冈县知事石川嘉延是习总书记刚到浙江工作后会见的第一个外宾。后来换了一个新的知事，新知事跟我们联系，希望能够和老知事一起拜见习总书记。那时候习总书记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但他仍然欣然接受。新知事受到习总书记接见以后，更坚定了对华友好的立场，静冈县后来还被全国友协授予“对华友好城市交流合作奖”。习总书记担任党的总书记后，还会见在浙江工作期间出访见过的外宾，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韩国前总理李海瓚。

还有一点感受，就是习总书记知识涉猎非常广泛。在出访过程中，他很喜欢和我们聊天，讲故事、电影、书籍，不管古今中外的，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我还记得陪同习总书记出访法国的时候，他还特地去看了诺曼底战役的盟军登陆点，一边看还一边给我们讲述整场战役的来龙去脉，许多细节都讲得非常到位。讲到战争为相关国家与人民带来的灾难，习总书记低头沉思了良久。我总觉得，与习总书记相处，能够感到他就像一泓取之不尽的泉水，表面上波澜不惊，但总能不断带给我们新的收获与震撼。

采访组：在您和习近平同志接触中，还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事吗？

阮忠训：有一件事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就是习总书记帮助实现美国著名教育家、外交官司徒雷登毕生心愿的故事。

大家知道司徒雷登，大多数都是因为毛主席的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司徒雷登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前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悻悻地离开中国。但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司徒雷登虽然是美国人，但出生在杭州，会讲一口流利的杭州话，从小对杭州有着深厚感情，他父母和弟弟是传教士，他们的骨灰都安葬在杭州。他曾投身中国教育事业，是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致力于筹款扩建、培养人才、聘请名师，为建设燕京大学呕心沥血。为支持抗日，还被侵华日军关

进监狱四年，绝不屈服。他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人。司徒雷登在华工作生活了 50 年之久，他在回忆录里写道：“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晚年的司徒雷登常常望着中国的方向，身在美国却盼着回中国。他心底执着地以中国为家，卧室的墙壁上四处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由于他一生多半时间在中国，他回到美国以后，美国政府不给他任何养老保险，一直由他的秘书傅泾波以及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一家照料，直到 1962 年病故。

到了 21 世纪初，傅履仁已经是美国百人会（由贝聿铭、马友友等杰出美籍华人于 1989 年创办的美国华人精英组织）会长，也是美国唯一一位华人将军。2006 年，我们在美国访问时，傅履仁主动提出想见习总书记。习总书记欣然答应。餐叙过程中，傅履仁谈到，司徒雷登去世之前有一个愿望，希望能把骨灰葬到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里。如果这个愿望实现不了，他希望能够“叶落归根”，葬到他的出生地杭州。我刚才讲了，司徒雷登在中国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改革开放初期，傅履仁父子同国内联系过，本来有关方面已经同意司徒雷登的遗愿，但后来十几名教授联名抗议将司徒雷登的骨灰葬到北大，这件事情就搁浅了。

当时我们也觉得，司徒雷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的骨灰安葬，是一个很敏感的政治问题。一般的省级领导甚至中央领导都不会去触碰。但习总书记非常有胆识，他对我说：“你回去之后帮他联系，能办就帮他办下来。”我回来以后，就去联系教育部和北大，但北大还是反对。我又请示了外交部领导，也征求了习总书记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如果北京不行，就到杭州来。费了很多周折，最后经浙江省和民政部批准，终于将司徒雷登的骨灰葬在了杭州安贤园。傅履仁将军及家人得知此事，都非常激动，他们把司徒雷登的骨灰送到杭州的同时，也把司徒雷登的遗物如张大千、徐悲鸿等名家送给他的字画全部送还中国，放到杭州司徒雷登纪念馆里。

2008年11月18日，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先生参加了司徒雷登骨灰安葬仪式并发表感言，他说：“中国是司徒雷登先生热爱的国家。他出生在杭州，今天回到这里，完成了他的人生旅途。他相信教育是加深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变化，他一定会非常高兴。”让我们没想到的是，这件事在国外特别是华人圈中引起强烈反响。有一次我到香港去，一位知名港商对我说：“咱们浙江做得好，把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了。这就让美国和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是有情有义的。习总书记在这件事情上展现了我们中国的胸怀和气魄，他是有大智慧的！”我想，司徒雷登在天之灵，也一定会对中国人民把他的骨灰安放在出生地而感激、欣慰。钱江边、西湖畔，这位出生在杭州的美国名人，终于在杭州安息，浙江历史上这富有传奇色彩的一页，体现的是习总书记的博大情怀。

习总书记在浙江工作4年多时间，给外事工作留下了巨大的宝贵财富，一方面是对外活动交往的增多、对外经贸活动的增强、友好城市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就是提升了浙江在中国整体外交工作格局中的地位，有力推动了浙江的对外开放，使浙江的外事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浙江省外办被外交部授予外事工作突出贡献奖。这是建国以来外交部唯一一次对地方外事工作授以荣誉。

浙江就像是一片试验田，是习近平总书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治国理政思想的发端之地。几年来，看着习总书记支持和倡导的一场场精彩、成功的主场外交，领略着他大气、恢宏的外交格局，我们都深深地为之赞叹。他的战略智慧、博大胸怀，以及散发着强烈气场的人格魅力，不仅征服了我们，也将为世界人民由衷折服。

来源：《学习时报》2021年3月26日

“习总书记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角色，大刀阔斧地开局”

——习近平在浙江（二十）

采访对象：王同元，1958年5月出生，浙江慈溪人。2000年5月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2003年2月兼任省委办公厅主任，2005年2月任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党委书记、总裁。2018年6月退休。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7年9月19日

采访地点：杭州市大华饭店

采访组：王同元同志，您好！您在浙江省委工作多年，习近平同志从福建来浙江工作的时候，您到福建去接他，请您讲一讲当时的过程。

王同元：好的，习总书记是2002年10月来浙江工作的。那年国庆长假后上班第一天，省委秘书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知说：“中央已经决定调习近平同志来浙江接任省长职务。根据省委主要领导意见，由乔传秀（时任省委副书记）带队，王培民（时任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海玫（时任省政府办公厅主任）和你（时任省委副秘书长）一起代表省委去福建迎接习近平同志”，并当场交代了一些具体的工作环节。

经过与福建方面的沟通，我们一行四人于10月10日乘坐10点多的飞机前往福州，下榻省委招待所。下午两点半左右，习总书记来到招待所会见我们，与大家一一握手，待人非常热情，让人倍感亲切。乔传秀同志首先代表省委和省委主要领导对他来浙江工作表示衷心欢迎，随后大家商定了具体的日程安排。习总书记对我们一行专程来福建迎接他表示感谢。他说，浙江和福建同处东南沿海，两地山水相依，文化相通，人缘相亲，自己对浙江印象很好，能到浙江工作感到很高

兴。

虽然我们四人与习总书记都是第一次见面，但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直观的感受是，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很年轻很干练，经过多年领导岗位上的磨砺，举手投足十分稳重，身上有着独特的风采魅力，很有“气场”。

10月11日下午，我们陪同习总书记乘坐两点多的飞机前往杭州，同行的还有时任中组部副部长孙晓群和有关同志，抵达后安排在大华饭店临时住宿。

10月12日下午，省里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孙晓群同志宣读了中央决定，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提议人选。

当天晚上，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投票决定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副省长、代理省长职务。从这天起，习近平同志就以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身份在浙江展开了紧张而有序的工作。

采访组：最初在一起工作，习近平同志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王同元：实际上，习总书记当时在全国已有相当大的知名度了。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央党校三年的学习期间，就听说过不少有关他的成长经历和工作业绩，那时他就是我们青年干部的一个学习榜样，我后来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工作动向。他从正定到厦门、宁德、福州，再到福建省政府担任主要领导，从基层到省里，从政府到党委，各个层级历练，具有丰富的工作经历和领导经验。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也比较关注他写的文章和书，很喜欢他的文字，因为既有思想的理论性，又有工作的实践性，语言朴实，话说得很清楚。所以，只要在报刊上看到他的文章，我都会留起来。就在他到浙江工作的前几个月，我还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他的一篇署名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这对担任过县委书记的我来说，印象尤为深刻，所以内心一直对他充满着敬意。他写的书，我也买来看。比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展山海宏图创世纪辉煌》等，都是我认真阅读的书籍。

有一次，我对他说：“你写的书，我都买了，都在看。”他说：“你那里有几本？”我说：“我现在有三本。”他说：“你没有的，我再送你。”过了几天，他送了我《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考》等几本书，这些书我至今还很好地保存着。

后来，我和他在工作上接触多了，对他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他待人亲和，热情周到，特别有谦谦君子的气度，既不喜形于色，又有不怒自威的气场。他处事干练沉稳，很有条理和章法。遇到大事胸有成竹，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遇到比较难的事，马上就能找到关键点，打开工作的突破口。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同志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王同元：2002年11月20日，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张柏林来到浙江，宣布习近平同志接任浙江省委书记。习总书记开始主政浙江，他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角色，大刀阔斧地开局。

记得在当天的领导干部会议上，习总书记对前任书记给予了充分尊重和高度肯定，对做好浙江下一步工作充满了信心和决心。他说，这次中央决定由我接任省委书记，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到浙江工作才一个多月时间，对这次岗位变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走上新的领导岗位，对我来说，有一个转换角色、适应工作的问题。我深感担子重、责任大。但是，我有信心有决心和同志们一起，共同努力把浙江的工作做好。他在会上强调，浙江是个好地方，是个干事业的地方，是个能干成事业的地方。自己一定会竭尽全力，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努力做到勤奋敬业工作，脚踏实地做事，以实干聚民心、以实效促发展，克己奉公，干净干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干部、取信于民，向全省干部群众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言为心声。当时听了习总书记的讲话，我又进一步感到他谦逊中透现自信，朴实中充满智慧，严谨中饱含激情，沉稳中蕴藏力量，让我们深受感染，也备受鼓

舞。

习总书记的工作是有自己特色的。最主要的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通过调研开局，确定目标方向，理清工作思路，制定战略措施，抓好执行落实。他强调，做工作首先要谋篇布局，然后要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有“钉钉子”精神；当然也不是零敲碎打地抓、布置一项抓一项，而是要“并联”起来，分头推进，整体落实。

在2003年召开的第一次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上，安排的主题就是“转变作风，加强调查研究”。他在会上专门强调了调研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新年第一次学习，确定调研为主题，是有现实和长远考虑的。以调研开局，以转变作风入手，着眼于全局性问题进行调研，实际上也是抓落实的过程。他结合省里的实际，提出了七个方面的调研课题，会上还建立了调研工作制度。当时，省委办公厅有个任务，就是根据习总书记的指示，起草他每一周的工作安排表。上报的工作安排表上，调研行程总是排得满满的，习总书记审定时，总是只做“加法”不做“减法”，以至于许多工作安排只能临时调整到晚上。在办公厅的行事日历上，可以清楚地查阅到，他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深入基层和部门调查研究。

他到浙江履新后，便马不停蹄地走企业、下农村、去海岛、进山区，密集开展调研工作，全面了解浙江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状况，从代省长到书记的那一个多月时间，他一直在浙江各地跑，了解和熟悉省里的情况。白天调研、视察，晚上查阅市志、县志，了解各地的历史沿革，把情况掌握得很透。他还几次召开退休老同志座谈会，虚心向他们请教。他表示，自己到浙江还是新兵，要尽量缩短“学徒期”，主要任务是学习，主要方法是调研，把握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一任接着一任干。同时，他还积极听取中央部门和兄弟省份对省里的意见和建议。

到了12月，我们开始筹备2003年1月召开的省两会。由于这是一次换届会

议，所以会议内容特别多。那段时间，习总书记就更忙了。他专门召开了一次省委常委会议，听取两会筹备情况，提出了从成立两会临时党组、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人事安排到舆论宣传、社会稳定等八个方面的具体要求，为开好两会指明了方向。

省两会开始后，我一直陪着他到各市代表团参加讨论，最后他还要发表讲话。听了他的讲话内容，我发现他虽然到浙江的时间不长，但对各地的情况已经非常熟悉了，每次讲话都能讲到点子上，与会的代表都感到非常惊奇。比如，到温州代表团，他就重点讲了欠发达地区的问题。他说，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均衡发展，这是政治问题和战略问题，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温州的发展一直很不平衡，富的地方很富，但穷的地方还很穷。温州经济的特点是发达地区呈块状分布，贫困地区呈点状分布，所以，扶贫一定要精准，要真扶贫，扶真贫。这和中央现在提出的精准扶贫思路是一以贯之的。

到了舟山代表团，他强调了舟山的经济战略地位。他说，舟山的海洋面积大，海岸线长，海岛资源非常丰富，虽然目前发展还不是很快，但随着时间推移，后发优势就会显现出来，发展潜力很大。他还讲到，开发海岛旅游过程中，要坚持开发与保护并举；要发展临港工业、多级仓储，特别是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快推进大陆的连岛工程。这个想法很具前瞻性，今天舟山的发展，总体就是按照他当时的设想稳步前进的。

习总书记是“干部下基层”的践行者，他在基层付出了汗水，也获得了宝贵财富，所以他一直强调把调查研究当作“基本功”。直到今天，我还清晰记得他在省委办公厅一次会议上说过的一段话：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一个省委书记可以下乡蹲点一个多月，现在很难做到，因为工作环境和机制不一样了。我到浙江工作15个月多，除嘉善县外，其余89个县（市、区）我都去了，杭州、宁波等市去了20多次，这也是现代化的好处，信息、交通都比较便捷。但我们在“深入解剖麻雀”上做得还不够，在一个地方能住一个晚上就算不错了。下基层怎样

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不接触基层干部是不对的，毕竟他们掌握当地的实际情况比较多一些；但如果只是接触干部也是不对的，那是脱离群众。你如果完全按照当地党委政府的安排也是不对的，但完全不按照他们的安排来，也会乱套。这里要讲求求真务实，怎么合适怎么来。一定要转变作风，体现求真务实，不懈地进行改革，改进存在的不足，改善不良的状况，解决问题所在。这两条请大家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取得一些经验，这也是当好参谋助手的一个方面。他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工作认真、精力充沛，基层调研时走家入户，看得真切、问得仔细，走到老乡中间去和他们面对面谈心，深入了解情况，可以说把调研工作做到了极致。

采访组：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工作期间，有哪些事情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同元：这方面的事例很多，我在这里着重讲几件。第一件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制定“八八战略”。

这个战略规划制定，是基于习总书记对当时国情、省情深刻变化的前瞻性把握，更基于他的辛勤调研、勇于探索、不断思考、科学概括。习总书记上任时，浙江发展正值关键期：增长方式的转变、各项改革的攻坚、开放水平的提升、经济结构的转型、社会矛盾的交织，既有成长中的难得机遇，更有成长中的诸多烦恼。怎样高屋建瓴地谋划浙江发展的新战略，是当时摆在习总书记面前的重大课题。他在调研思考中发现，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几个优势，而为了更好地发挥这几个优势，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所以“八八战略”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有两句话，前面一句是归纳总结已经形成的优势，后一句则是进一步改进提高所要采取的措施。“八八战略”的雏形，就是他通过不断调研思考总结后，包括向中央领导和部委同志汇报浙江的情况时，分析归纳、精心提炼、逐步形成和丰富起来的。

2003年7月召开的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他正式阐释了“八八战略”的内容，文字表述就非常完整了。经过与会同志广泛深入的讨论，正式把这八个方面确立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简称“八八战略”。

现在回过头看，这是习总书记在把握历史进程、顺应历史规律、充分发挥浙江自身优势基础上，对浙江发展提出的系统性战略谋划，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这个战略规划提出，填补了此前浙江在发展战略方面的空白，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2005年，我因身体原因离开党政机关。当时习总书记对我非常关心，几次征求意见，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调我到省广电集团工作，并嘱咐我注意劳逸结合、养好身体。我到广电工作后，为了使新闻宣传能紧紧围绕省委中心工作来开展，要求浙江卫视集中力量组织了近百集的大型系列报道《“八八战略”在基层》，反映全省90多个县（市、区）贯彻落实“八八战略”的生动实践和崭新成就。这个报道播出后得到了习总书记的充分肯定。他说，《“八八战略”在基层》我每集都看，一些基层工作的情况让我有了更深的印象，这个系列在基层也反响热烈，说明效果是好的，起到了宣传“八八战略”、推动“八八战略”深入实施积极作用。他还说，“八八战略”是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的具体实践，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基层家喻户晓。

“八八战略”不仅开出了破解浙江“成长的烦恼”的良方，而且为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作出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八八战略”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并萌生出平安浙江、法治浙江、文化大省、生态省建设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决策部署。习总书记当时说过，省委抓浙江的发展，从几个角度出发，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我们抓经济，就是深入实施“八八战略”；抓社会建设和发展，就是建设平安浙江，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再

一个，加快文化大省建设，增强构成浙江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还有就是抓党的先进性建设，切实增强执政本领。这是习总书记在省域层面，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开创性地进行战略谋划和具体实践，体现了以习总书记为班长的省委领导班子高瞻远瞩的谋略、先试先行的胆识、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气魄，具有鲜明的浙江特色和时代特征，为中国发展的“浙江样本”建设开拓了局面、奠定了基础。

第二件事，他积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带领考察团赴上海和江苏考察。

习总书记到浙江工作后，就提出要加快对内对外开放步伐，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融入大上海，接轨长三角”，使浙江经济既能走出去，又能引进来。在省两会期间，他专门找我布置起草赴上海、江苏学习考察方案的任务，并详细提出了“学什么”“怎么学”“回来以后怎么干”等一系列考虑。事后我向秘书长作了汇报，起草了一个学习考察方案，经习总书记同意后，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2003年3月21日，习总书记率领省党政代表团对上海、江苏展开了为期5天的学习考察，成员包括省级领导和各市委书记以及有关部门一把手共80余人，规模空前。

在绿树环抱的上海西郊宾馆，习总书记表达了此行的目的：虚心学习、主动接轨、真诚合作、互利共赢。结束对上海的考察后，习总书记又率队赶往江苏。在南京，他再次表达了与上海之行相似的意图。5天时间里，浙江代表团马不停蹄，学习考察了上海、江苏的多个地方。作为此行的重要成果，浙江与上海、江苏分别签署了进一步推进经济合作、技术交流的协议，并就习总书记提议的建立三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的设想达成共识。

对于为何要建立定期会晤机制，习总书记表示：完善的合作机制是加强经济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证，“要从政府、企业、民间等多方着手，健全合作机制，建议建立沪苏浙三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

制，坚持和完善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制度，进一步探索建立有组织、可操作的专项议事制度，积极推动各类经贸活动的开展”。

沪苏之行后，“接轨上海”成为浙江发展的关键词。回到杭州后，3月27日，省里马上召开了关于学习上海江苏经验、推动长三角合作发展的动员大会，习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详细阐释了推动长三角合作的重要意义，明确了指导思想，提出了主要目标任务。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的若干意见》，要求进一步发挥浙江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

正是他的这些前瞻性、战略性决策，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如今的国家战略，使中国经济主要发达区域开启了全新的发展格局。现在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已经实现企业注册登记、社保基金办理等60多项业务互联互认、跨省共享，为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第三件事，他大力推进信访工作，亲力亲为落实“下访”制度。

习总书记把信访工作与基层调研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从当时浙江“三访”（越级访、重复访、集体访）增多、信访热点问题突出的实际出发，倡导领导干部“下访”。他对我们讲，信访反映民生，民生关乎民心，民心连着党心，带着感情下访、真情接待来访，这既是掌握基层第一手情况的重要途径，更是践行群众路线、帮助百姓解决实际困难的有益行动。

他提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省委常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的领导同志，都要下基层受理群众来信来访。从2003年6月开始，先在浦江县、诸暨市开展了领导下访试点工作。在试点的基础上，同年8月省委常委会专题听取信访工作汇报并作了研究部署，决定在完善每月领导信访接待日制度的基础上，层层建立领导干部下访接待群众制度，要求全省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抓信访，带头搞下访，并规定要把领导干部在一年当中到基层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的次数作为

考核指标。我想，习总书记制定这项规定的用意很深，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让“深入实际、为民服务、走进矛盾、破解难题”从省委书记的个人行为变成领导干部队伍的集体行为，上升为常态化的制度机制。这对全省干部队伍进一步树立群众意识、改进工作作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习总书记曾说过：“下访接待群众是考验领导干部能力和水平的大考场，来访群众是考官，信访案件是考题，群众满意是答案。”他自己就是抱着“赶考”“答卷”的心态，认真对待每次下访的。下访前，他让基层提前广泛告知，以确保群众能够知晓，方便群众准备。每次他选定一个地方下访，都要连续几天通过当地新闻媒体提前播报消息，让有诉求的老百姓进行预登记。各乡镇（街道）还要张贴正式公告，使省委主要领导要到这里来接访群众的消息迅速传遍十里八乡。为方便群众来访，接访点设立了登记咨询点、休息区、候访区，开设了综合、土地拆迁、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劳动和社会保障、基层党组织建设及反腐败、农林水利、交通基础设施、涉法涉诉等十多个来访接待室。在接访室里，他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诉求，不时与省市县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随行律师进行商量，与上访群众耐心探讨，凡是能解决的问题，当场予以解决；对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进行交办处理；对有政策规定但群众不太理解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努力使群众带着微笑和满意而归。

习总书记大力推进信访工作，而且敢于啃硬骨头，下大力气解决一些老大难和历史遗留问题。这里我讲一下关于解决黄岩两会问题的事。

20世纪90年代中期，台州撤地设市，同时把黄岩撤市设区，给黄岩的财权和事权带来较大影响，给当地老百姓的工作生活带来诸多不便。黄岩的干部群众心里有股怨气，频频上访，省里也收到过许多信访件。每逢区里召开两会期间，媒体舆论和群众信访都会引起较大的反应，这样的情况持续了8年。到了2003年恰逢召开换届选举的两会，没想到开了2天就进行不下去了，黄岩区出现了全

国罕见的“留守”政府，台州市做了大量工作还是解决不了。当时习总书记来浙江主政还不久，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下决心要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我记得当年7月正在召开省委全会期间，省委副书记乔传秀找到我说，根据习总书记的意见，省里要组织一个调研组，由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人大法制委和省财政厅等有关单位的同志组成。你在县里当过一把手，由你牵头当组长，把问题了解清楚后，向省委写出调研报告。事后我率调研组赴黄岩，对撤市设区后存在的问题进行调研。通过听取多位市、区和有关部门领导意见，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特别是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的座谈会，并向群众个别私访听取他们的诉求，查阅有关档案资料，基本摸清了问题的症结，调研组向省委提交了调研报告。我印象很深的是，习总书记对这份调研报告看得非常仔细，几乎每页纸上都划了杠杠，并提交省委书记办公会议进行研究。经讨论，习总书记提出了解决黄岩问题的5条具体意见，要求台州市委执行落实。此后黄岩区顺利召开了两会，至今都很平稳。黄岩两会问题的妥善解决，不仅体现了习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对地方工作规律的科学把握，更体现了他不回避矛盾、敢于较真碰硬、善于攻坚克难的担当和魄力。

第四件事，他大力突出省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强化党的领导。

在党的建设方面，如何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好地方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这是习总书记一直思考和探索的课题。当时社会上包括党内一些同志，对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法检两院的关系是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的，认为“党委应该抓虚、政府应该抓实”，甚至个别同志把分管工作当成自留地，觉得没必要向党委报告，不然就是“党政不分”。但习总书记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强烈的使命担当和追求真理的勇气，立足浙江工作实际，与时俱进地贯彻落实管党治党方针，坚持不懈地推进党的建设。

他从政府转到党委工作后，首先考虑在省级层面如何实施党委对重大经济工

作的领导，既不越俎代庖，更不能缺位失职。他在会上多次讲，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党委不抓经济工作是“半截子”党委，只有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才可以更好展开。习总书记抓经济工作这个“牛鼻子”，是从一件看似很小，但以小带大、小中见大的事情入手的。

2003年初的一天，习总书记专门把我叫去，交办了一个任务。他说，中央有一个财经工作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的工作职能、组成结构、成员分工，你去了解一下，再结合省里的实际情况，拟个方案给我。按照他的指示，我了解了有关情况，向他作了汇报。2003年2月，经过省委常委会讨论，正式成立了省委财经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书记、省长、常务副省长等组成，具体事务由省委政研室承担。这里还有个插曲，当时发通知时，常务副省长缺额，只好写上职位而没有具体名字。这个小组成立后，有关全省的重大经济政策、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及经费支出，都需报该小组研究决定。

省委财经领导小组的成立，从体制上保证了省委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也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提供了组织保障。我记得，小组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就是专题研究全省的电力发展问题。当时电力供应紧缺已经成为制约浙江经济发展的瓶颈，夏季高峰经常拉电，对老百姓生活影响也很大。习总书记在会上提出了“围绕中心、电力先行、适度超前、积极平衡”的十六字方针，要求政府部门重兵布阵、全线铺开。除确保投产装机容量1000多万千瓦外，还要完成500亿元的电网项目投资，使全省电力建设在5年内有一个超常规发展，以适应经济快速发展需要，保障居民生活用电需求。这个重大项目实施后，我省从2007年开始夏季高峰拉电的现象越来越少，现在早就成为了历史。

习总书记经常讲，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虽然有其自身的内涵和要求，但最终还是要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上，体现在党的各项建设上。

以他为班长的浙江省委积极探索和完善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理顺关系，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建立健全了“省委一个核心，人大、政府、政协三个党组”的领导体制、决策程序和执行机制，构建分工协作、责任明确、程序严密、民主科学的制度体系，有力强化了党委把方向、谋全局、议大事、管干部、促落实的职能，保证了党委领导核心作用的充分发挥，推动了党的全面领导的具体落实。从2004年1月开始，省委常委会每年都要听取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党组的汇报，充分体现了省委在全省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反复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政治定力，在明辨大是大非、排除重重干扰后旗帜鲜明地提出来的，也是他持之以恒的思想。从实践效果来看，“三个党组”向党委报告工作，也是一个民主集中、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过程，可以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

第五件事，他对办公厅的工作非常重视。

办公厅是省委的办事机构，省委领导的指示都要通过办公厅来传达协调、落实督办。习总书记对办公厅工作非常重视。他到省委工作后，经常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到各处室走走看看，与大家寒暄交流，非常亲切。他指出，办公厅是“核心要害部门，既是参谋部、联络部、执行部，又是‘总开关’‘总枢纽’‘总调度’”“省委提出大的思路，办公厅的同志要帮助出主意；省委作出大的决策，办公厅要制定具体方案；省委勾勒蓝图，办公厅要描绘细节，具体深化；省委提出目标，办公厅要考虑‘行军路线’，做好‘搭桥铺路’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省委的工作效率能否得到提高，重大工作部署能否得到落实，形象和威信能否得到维护，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办公厅的工作。

办公厅的同志都记得，习总书记每年都会来参加省委办公厅的总结表彰会和他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看望慰问大家。在会上，他要求办公厅紧紧围绕中央

精神和省委部署开展工作，进一步提高办公厅队伍的整体素质，把忠诚放在第一位，牢记理想宗旨，坚定作为。他提出的“激浊扬清、敬业乐业、乐在人和、力戒浮躁、贵耳重目、求知善读、戒奢节俭”二十八字要求，成为办公厅干部职工一直以来的遵循和引领。

工作中，习总书记十分注重与办公厅同志相互交流，他说：“不仅我谈，你们也谈。我谈对大家可能是一种提示，有时是工作部署，让你们知道现在领导在想什么。你们谈对我是一种启发，不同的渠道，不同的资讯，也是参谋作用。”

刚才我讲了习总书记特别重视基层调研工作，在这方面他也注重发挥办公厅的作用。当年他还亲自发起了办公厅干部在省委领导参加全国两会期间深入基层开展调研的活动，要求干部多到有困难的地方、最偏僻的地方、最不发达的地方去看看，到老百姓家里和群众拉拉家常，到企业、田头看看情况，了解大家的所思所盼，把领导干部平时下去看不到听不到的情况原汁原味反映给省委。大家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对每份调研报告都看得很仔细，划过许多杠杠，作过很多批示，由此发现和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习总书记对办公厅的文秘工作也特别重视，经常与大家交流写作心得。他的组织关系在办公厅综合一处党支部，该处的同志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有幸聆听他对文稿起草的真知灼见。2004年在参加党支部组织生活会时，习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文风的改革，我还是那句话：‘求短、求实、求新’。文稿宜短则短，宜长则长，开题单刀直入，分析鞭辟入里，论证顺藤摸瓜，结论水到渠成，让人听了以后感到思路很清晰，观点很明白，重点很清楚，要求很具体。”求短，就是要用尽可能短的篇幅把问题说清、说深、说透；求实，就是要追求朴实的文风，所用的语言不一定华丽但要准确，要实实在在，直奔主题，言简意赅，实话实说；求新，就是要根据特定的讲话场合写出有特色、有新意的文稿。后来他参加生活会的时候又说，文风体现一个领导干部的能力和水平。有的人讲话光风霁

月，让人觉得简单明了透彻，而有的人讲话云遮雾绕，让人捉摸不透。领导干部要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负责的态度，在讲话中勇于坚持对的、反对错的，观点鲜明，态度明确。对于工作，对于问题，对于群众，绝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云遮雾绕，玄之又玄，其实是能力不够、水平不高，既弄不明白问题的是非对错，又怕承担责任，所以只能装腔作势，故作高深。他在一篇《文风体现作风》的文章中还指出，最要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文，那种“穿靴戴帽”、空泛议论、堆砌材料、空话连篇、套话成串、“大而全”、“小而全”等弊病，都要防止和克服。

习总书记除了对办公厅工作提要求外，对办公厅干部的学习和生活也是非常重视的。他经常说，办公厅的工作很不容易，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年复一年，连日连夜，加班加点，任务是无穷的，完成一个任务就是另一个任务的起点，可以说没有句号，其中也包含家人的奉献。因此他非常体谅、关心办公厅的同志，政治上重视办公厅干部的成长和使用，生活上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使办公厅的同志感到温暖，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干部的积极性。大家的工作热情也空前高涨，力求恪尽职守、追求卓越，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使命感，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不辜负习总书记的信任和期望。

来源：《学习时报》2021年3月26日